

传 / 承 / 历 / 史



开 / 创 / 未 / 来

泰兴历史文化

主管：政协泰兴市委员会

主办：泰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泰兴历史文化》编辑部



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 李仁国

枫叶红,果正香,秋收转冬藏。在这样美好的季节里,我市历史文化丛书首套作品《泰兴馆藏书画》正式出版发行。我们对《泰兴馆藏书画》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此给予全力支持、作出无私奉献、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研究历史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坚守,更是对民族责任的担当。泰兴置县于南唐,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作为吴楚文化的交融之地,这里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历史文化蕴含丰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泰兴人民用自己的心血、汗水和卓越的创新精神,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承载着泰兴的历史积淀、思想智慧,也彰显着泰兴人的独特气质和精神风貌。开展历史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现实,清醒地观察未来。研究泰兴历史文化,务必自觉地把现在的社会实践活动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并进一步强化“以史为鉴”的理性精神。泰兴历史文化中,包含着代代泰兴人的追求、理念、向往、愿景和信仰,而正是这些历史的积淀,构成了泰兴成长、发展的精神能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实文化一旦失去历史理性的牵引,其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必将遭遇数典忘祖、任人打扮和自我矮化的窘境。因此,越是社会发展,我们越应该意识到历史文化与现实及未来的一贯性、传承性和不可分割性。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把物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文化瑰宝挖掘出来,把散落在民间小巷的历史文化采集起来,并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使之成为后来人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这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泰兴历史文化,首先是一种记忆。仙鹤湾的仙鹤、凤凰天的凤凰、花园河的古槐、南草巷的皂角树、北草巷的紫藤是一种记忆;孔庙、遗带亭、冢宰坊、古戏台以及独支旧址、新四军黄桥战役旧址等红色遗存也是一种记忆。这里,有沧海桑田的记忆,有生活三味的记



忆,有世道艰辛的记忆,也有血与火的记忆……总之,这些挥之不去、时隐时现的记忆,构成了一幅幅精彩纷呈的“历史文化”画面。

泰兴历史文化,也是一种积累。这种积累,小若沧海之滴水,众若恒流之沙数,时而涓涓细流,时而浪潮激荡。这些林林总总、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积累。《泰兴馆藏书画》的问世,正是得益于市博物馆的同志们对于历史文化片段的潜心寻觅,细心珍藏,进而才取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厚积薄发、久久为功的效果。当然《泰兴馆藏书画》的出版也离不开本书编辑诸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反复推敲、评鉴和取舍,可谓精打细敲、匠心独运。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书画界各位竭诚奉献的结果。

文化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东西,她像涓涓溪水,又如点点甘露,润物无声,滋养着后人。研究历史文化,既要善于“寻门而入”,又要善于“破门而出”,实现钻进去与跳出来的统一,把握跳动着的音符,择其要者而言之。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系统研究,悟兴衰之道,明进退之度,知福祸之由。从历史演变中把握灵魂,从艺术品味中陶冶情操,做到在整理中探索,在传承中升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增进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热爱泰兴、建设家园的热情。其次,历史文化研究要用心于“真”,致力于“实”。坚持做到“四真四有”:真诚——有抑制不住的渴望;真实——有滴水穿石的积累;真切——有举重若轻的洞见;真理——有抽丝剥茧的论证。第三,历史文化研究要始终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紧紧把握服务现实的时代使命。要把尊重自然、热爱生命、崇尚和谐、开放包容、仁爱孝廉、美善相乐的传统文化精神,融入到当代生活中去,通过传承文源、拓展文脉、聚集文气,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研究的借鉴传承之功效,实现泰兴文化的创新发展。

泰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泰兴历史文化的研究,积极支持《泰兴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历史文化研究,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希望编委会各成员单位按照既定计划,抓紧开展相关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确保按时完成任务。让我们继承和发扬泰兴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肩负起传承历史文脉、服务泰兴建设的光荣使命,为建设文明富强美好的新泰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泰兴历史文化

2015.4 第一期 总第13期

泰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会长/ 张泽民

■副会长/ 戴仁泉 高寿林 张春山 孙 钦

■秘书长/ 周国庆

■副秘书长/ 严华明 袁 玲

江 勇 赵固平

■理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松林 卞维国 王向群 刘 峰

刘鹏旋 林 林 杨美兰 许光明

张 敢 张舒琴

TAIXING History & Culture

卷首语

2/文化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 李仁国

本期专讯

6/文化泰兴建设的里程碑

◎ 周国庆

纪念朱东润诞辰118周年专辑

8/泰兴人民的朱东润情结

◎ 赵固平

9/但酬光与热 哪计利和名

◎ 陈尚君

15/朱东润师文存的整理

◎ 陈尚君

18/朱东润先生的精神与境界

◎ 王水照

20/一身傲骨朱东润

◎ 佚 名

人物春秋

22/让胡适惭愧的丁文江

◎ 魏邦良

24/鸿胪寺主簿何嵩

◎ 何正元

26/悄然走过的葛醒楼

◎ 叶 子

28/故国情怀莲社贤——记诗僧休隐上人

◎ 曹 韵

红色记忆

33/苏中自卫反击战中的泰兴攻城战

◎ 何锡龄

36/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 周文汉

37/草鞋司令陈玉生与周茂敬的生死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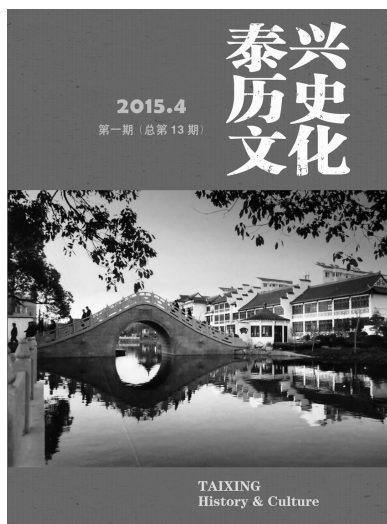
◎ 周文汉 孙谷星

39/短枪队长黄凌强

◎ 孙谷星

41/卞保胜的“顺口溜”

◎ 周同成



文化遗存

- 44/张京元与《删注楚辞》◎ 张 定
48/季三嗒子的故事◎ 周同成
50/泰兴馆藏书画赏析◎ 沈佳惠
54/泰兴猫画收藏记◎ 汪念先
55/黄桥武术的源流与发展◎ 韩凤月

史海钩沉

- 59/泰兴首刹建安寺考◎ 丁 敏
64/王令树与“映日堂”◎ 王 健
67/花园巷的变迁◎ 郭镇远 葛正浩
70/杨文蔚抗命保档案◎ 汪盛华

文化论坛

- 71/农民暴动的历史画面◎ 延南林
73/以清白遗子孙 不亦厚乎◎ 严华明
75/泰兴的文化地标——奎文阁◎ 王云峰

方言俚语

- 77/泰兴方言考(七)◎ 朱时可

封面封底: 仙鹤湾风光带

封二: 泰兴革命烈士纪念馆

封三: 朱履先中将军

彩色插页: 泰兴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展

《泰兴历史文化》编辑部

主编/周国庆

副主编/严华明 张 进 孙建明

执行主编/赵固平 石启荣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琳 印九红 沈佳惠

张 定 张汉臣 周晓季

薛 燕

办公室主任/赵固平

办公室副主任/石启荣 张 定

版面设计/印九红

通联/沈佳惠

发行/《泰兴历史文化》编辑部

出版日期/2015年4月

刊号/苏出准印(2015)字

JSE—1000888

编辑部地址/泰兴市文化博览中心

邮政编码/225400

电话/(0523)87612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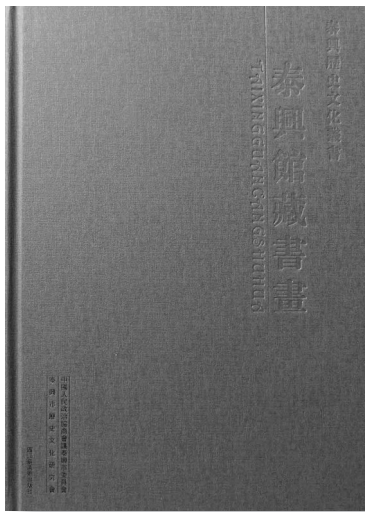
Email / txsbwg@163.com



◆编者按：2014年11月14日，泰兴市政协、泰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举行《泰兴馆藏书画》首发式，会上市政协领导李仁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见本期卷首语），编委会介绍了《泰兴馆藏书画》的编辑出版情况，现择要刊发，以飨读者。

文化泰兴建设的里程碑

□ 周国庆



在秋光灿烂、金风怡人的季节，我们迎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泰兴馆藏书画》凸显了历代书画名家的人文情怀和艺术造诣；凝聚了数代泰兴文化、文物工作者的守望与心血；实现了泰兴历任党政领导尤其是本届政协领导和文化、文博工作者的夙愿。是我市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促进文化泰兴建设的又一里程碑！

泰兴历史悠久，文风炽盛，儒气流长，曾孕育了一批极负盛名的书画家，自明代至民国年间，见诸经传的就有70余人，如张京元、陈潮、朱铭盘、季应召、汪仲山、程璋、朱东润等。他们的作品或柔婉、或隽丽、或秀劲、或雄健、或疏阔、或狂放，章法优美、气韵生动、风格各异，绚丽多姿，是泰兴现存书画作品中的瑰宝。此外，泰兴民间喜好收藏。元黄公望的山水画《富春山居图》、宋拓唐代大书法家李邕书《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均一度收藏于清代泰兴著名藏书大家季寓庸、季振宜之手。赵之谦、王文治、梁启超、曾国藩、郑孝胥、阮元、钱维城、吴让之、何绍基、王震、庄蕴宽、康有为等显赫名家的作品，至今仍收藏于泰兴博物馆。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于1991年创建了泰兴博物



馆。2000年,在兴建文化艺术中心的同时,建成了博物馆库房和展厅,增添了四防安全设备,将自上世纪50年代初陆续征集到的450余件字画妥善珍藏。2003年10月,筛选修复了150幅字画首次在文化艺术中心举办《馆藏字画精品展》。近年,市委市政府不恤重金又兴建了文化博览中心(三馆),其中有博物馆书画厅,常年免费开放。

我市政协领导高度重视泰兴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12年,成立了《泰兴历史文化丛书》编撰委员会,制订了《泰兴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纲要》和5年计划。《泰兴馆藏书画》的编撰工作被提上重要议程。泰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政协主席张泽民先生亲自挂帅,任主编,特邀著名美术史论家、南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积寅先生为之作序,邀请了高潜源、王晓平、幸平、陆峰、丁沛、江勇等先生参与编撰工作。

为确保《泰兴馆藏书画》的编撰质量,我们经过反复研讨、斟酌,从当初扫描的600余幅馆藏作品中遴选出品相较为完好、艺术水平较高、在艺术界有一定影响的精品力作224件。其中,泰兴籍书画家作品53件,有明代“风神潇洒”的进士张京元;清代师法健、杨欲仁、画猫第一人季应召、篆书大家陈潮、爱民如子的吴存义、“江南五才子”之一朱铭盘、侯万里、清明知县龙璋;近代汪麟祥、蔡宝廉、沈文翰(沈安娜的伯父)、“全才画家”程璋、杨体仁;现代“五体皆擅”朱东润、水利专家郑肇经、百岁老人韩秋岩、何德身等。非泰兴籍书画家作品171件,有明代张风;明末清初侯方域;清代曹禾、王澍、钱维城、王文治、阮元、包世臣、吴让之、曾国藩、赵之谦;近代何维朴、冯煦、张謇、韩国均、庄蕴宽、陈衡恪、郑孝胥、梁启超;现代胡厥文、匡亚明、黄养辉等。本书收入了北宋米芾行书卷、明代杜琼《山水》卷,清代恽南田、高其佩、黄慎、虚谷、近代王震七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或赝品或存疑,皆在名字后标一“款”字。虽不是真迹,但有一定的艺术欣赏价值,对研究作品真伪也有一定的用处。为便于读者鉴赏,本书还收录了泰兴籍作者25人、非泰兴籍作者112人简介。

在历时近两年的工作过程中,编撰者本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倍尝艰辛。其中高潜源先生晨昏不辍,查阅了大量的书画著录史料,又对馆藏四百多件书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品读和鉴别;市政协相关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和校正,严格把关;历史文化丛书办公室的同志认真勘误至每一个标点和每一个人名。最后,这部书从图片到文字,从装帧设计到印刷装订,均达到了精准、精美、精致的境界。

编撰《泰兴历史文化丛书》工程浩大,任务艰巨。我们将在市政协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努力工作,力争早出、多出研究成果。为发掘、研究、传承、宣传、弘扬泰兴优秀历史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泰兴人民的

朱东润情结

□ 赵固平

朱东润先生是泰兴人民的骄傲,更是家乡人民的楷模。

多年来,泰兴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采取多重举措,宣传、弘扬朱先生的事迹。一是维修扩建先生故居。2005年征地1.41亩,扩建了一进11间呼应原貌的仿古建筑。现故居总建筑面积有2000平方米,亭台回廊,荷塘山石,花木扶疏,水光云影,成泰兴靓丽一景。在故居内长期举办《朱东润生平事迹展览》。先生弟子、国学大师冯其庸为先生故居题词“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故居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常年免费对外开放。二是利用故居大力开展未成年人教育活动。从2006年起,每年举办“东润杯读书·做人征文竞赛”活动。在组织青少年学生参观时,为便于学习记忆,我们把朱东润的事迹编成“一、二、三、四”一连串数字:“一”说的是一个人,就是朱东润先生;“二”指的是朱东润的两句名言,“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读书人一生两件大事,做人,做学问,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才能有高低,但做人可马虎不得,一个人的文章再好,品行不足取,也就不足取了”;“三”是说朱东润爱祖国、爱党、爱家乡,家乡的事情常常往来于先生心中,殷殷情怀,感人至深;“四”是四个故事,其中一个讲述的是文革初期,先生为复旦大学第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权威”,横遭批斗,但他风骨凛然,义正词严的反驳:“我嘛,权威’勉强算一个,反动’嘛,则未必吧”,造反派将日本军刀架在先生脖子上,斥问:“你是什么东西?”先生倔强以对,“我是中文系主任”。我们还将东润先生的名言编印制成书签,随同宣传画册免费分发给学生。三是于2012年兴建了泰兴市文化博览中心,在其中开辟泰兴名人馆,将朱东润先生事迹重点展示。四是于2008年在朱东润先生故居成立了泰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每年编辑出版两期会刊,已出版12期,将研究、宣传朱东润作为其中的重要任务。五是泰兴市在新建城区主要街道设置“东润路”。六是在中小学设立朱东润读书班,与先生故居结对共建,常年开展活动。如此,东润先生的辉煌人生和高风亮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朱东润文存集》的出版发行,使先生的思想光辉更加闪耀,对我们深入学习、研究、宣传朱东润提供了深层帮助。感谢相关专家、学者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

邀请在座的大家赴泰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泰兴人民的朱东润情结。

[本文系作者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纪念朱东润诞辰118年暨《朱东润文存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但酬光与热 哪计利和名

——朱东润先生的人生和成就

□ 陈尚君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一生追求光明，探索学术，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学术著作，也在道德人格上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这是他1946年给儿子的题词，也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写照。

乃心念黎元，立志谢公卿

朱东润先生1896年12月6日出生于江苏泰兴，恰好是甲午战败的第三年，整个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如近代许多著名学者一样，朱先生曲折而壮阔的人生经历与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相始终，国家的危难、时局的变易在其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朱先生6岁读私塾，9岁入蒙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1905年废科举，由是转入新式学校就读，12岁考入南洋公学附小，尝从古文大家唐文治问学，17岁因吴稚晖推荐而远赴英国留学。恰逢新旧学问风气移易之际，他对两方面都能有深入的了解与体悟，既不偏废传统学问，更渴望系统学习西方真理，奠定了兼通中西的学问根基，为开拓中国学术的新局面尽了自己的努力。

朱先生面对近代中国的危难，力图通过自己的奉献与牺牲来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的三哥朱世澐因参加南京的新军起义而被杀害，他“感觉到共和制是三哥参加过的遗产，自己有维护这份遗产的责任”。1912年曾协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创办《公论报》，鼓吹革命，反对袁世凯专权，有“文笔雄健”之誉。1916年袁世凯称帝，朱先生激愤之下，放弃留学，回国参加讨袁斗争。1927年6月，曾受吴稚晖邀请，担任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因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感到失望，八十天后便挂冠而去。从此绝意宦途，转入教育学术工作。1928年起执教武汉大学，初任英文教师，后受闻一多的鼓励，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英文国学论著的课程，从而转入文学研究，成就他一生的事业。1942年后，又执教于中央大学、无锡国专、齐鲁大学、沪江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分配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直至去世。

授徒甘寥落，著书绝拜迎

从1917年任教广西省立二中开始，到1988年去世，朱先生担任教职的时间长达71年。早年的政治理想虽未能实现，但在那种艰难时世中养成的对于人生理想特有的坚韧与执着，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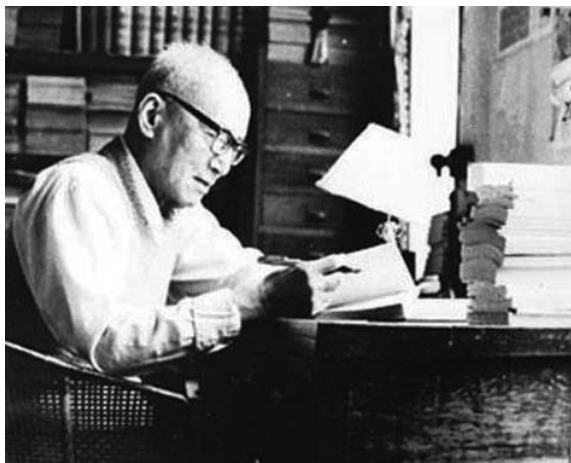


随着他一生,使他在任何动荡的时代都保持着自己的气节与风骨,不为时势所移易。他将这种精神传达给学生,也以这种态度严格律己,从事著述。

朱先生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是在1942年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写成的,先生自述当时的写作条件道:“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晚间写作只能借助油灯,先生在油灯上架个竹架,上安小茶壶。“油灯的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即便在日军空袭时,他的写作仍如常进行。以绝好的才份,从事最刻苦的努力,他的成就正是这样取得的。

1958年大跃进时,中文系也难免紧跟潮流,很多教师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研究目标。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朱先生允诺在一年时间内完成《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三本书。一年后随着大跃进狂热的减退,没有人再提及那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只有朱先生在繁重的行政、教学工作及政治学习之余,夙兴夜寐,腾出一切时间将三本书如期交出,其性格中坚定沉毅、一诺千金的作风于此展现无疑。

在文革中,朱先生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而被打到,其妻邝莲舫女士因不堪精神与疾病的双重折磨而含冤去世。朱先生冒着巨大的风险作《李方舟传》以纪念亡妻,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



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拨乱反正以后,先生以高昂的学术热情撰写新著,主持系务,培养学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国风更检讨,骚赋且争鸣

朱先生早年任教广西二中、南通师范和武汉大学,主要教授英语和英国文学。三十年代初,时任武汉大学文学学院的闻一多先生感到学校旧学氛围太浓,思以改变,商请朱先生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生答允的条件,是给一年时间的准备。在这期间,他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又连续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了十来篇古代文学批评家专题讨论的论文。《讲义》修订后改名《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于1943年出版;上述论文则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于1942年出版。这两部著作笼该上古至清末的文学批评,立论谨严,引证博洽,是该学科具有重要影响的开创性著作,至今亦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约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先生的研究转



入古诗和古史研究,成果结集为《读诗四论》(晚年再版时改名《诗三百篇探故》)和《史记考索》两书。前者包含《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论大小雅说臆》、《古诗说摭遗》、《诗心论发凡》四篇,所谈都是《诗经》的核心问题,都有独到的建树。其中《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对于《国风》出自民间的成说大胆质疑,从作品本身入手加以详细辩证,考察诗人的地位与身份,广引博征,证明《国风》百六十篇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为统治阶级人物的作品。通过对习见材料的重新解读,得出颠覆性结论,堪称典范之作。另认为雅即夏,据以判断大小雅极其正变的寓意,从批评史的立场阐发古诗说的意义,也曾广受赞誉。

他的《史记考索》是从《史记》基本文献梳理着手的专著,有许多独到的创见。如项羽到乌江而不肯赴江东,史书称羞见江东父老,以后学者大多不离此意。而先生则提出,当时江东已为刘邦所有,项羽已无路可走。依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江东子弟有十人封侯,功劳是以江东归汉。先生强调读书一定要注意作仔细的时间和空间的排比,要注意利用别人忽略的文献。历代研治《史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在《表》上花功夫的人却不多,真正能融会贯通者更少。

朱先生读书细密,目光如炬,富于自信,强调力透纸背,常常能以单刀直入的态度,抓住问题的关节点,加以细致的考订,发前人所未发。如前后《汉书》写更始帝刘玄,大都视其为羸弱平庸的傀儡人物。先生逐月排列了更始时期的政局变动和应对策略及人事布局,指出更始称帝前以豪侠称,称帝后一系列举措可见其具有掌控全局的杰出才干,其失败有很大偶然性。

对于光武帝刘秀,则指出其才干的平常,其成功决定于他的忍让,善于用人和寻觅机会。五十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四篇研究楚辞的论文,质疑屈原其人的真实性,推测今传《离骚》作者有可能是汉淮南王刘安,引起学术界极大的争论,余波至今未已。这些议论,看似随意,实得自对史籍的反复研读和体悟,绝非率尔之见。

中年以后,朱先生的工作虽以传记文学为重心的,但在文史领域仍有许多重要的建树。一是主持编选注释的高校统编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对于近半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影响深远,至今为止依然是最广泛通行的中文专业基本教材。二是在文革期间,主持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点校工作,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校点长编来看,无论是在文本的校勘还是校勘记的撰写方面都严格遵循规范,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可惜因为受到文革后期反对繁琐考证风气的影响,当时的校勘成绩没有能完全在点校本中得到反应。我们最近有机会完整接手当时的整理长编,阅读朱先生等前辈亲手书写的文字,深感当年的成就如高峰在前,令人向往。三是在古籍校注和学术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为写《梅尧臣传》而发愿整理梅尧臣文集,发现该集两种版本皆编次混乱,既不编年,也不分类。在反覆研读后才找到为全部梅氏作品编年的方法,即先定点,由点连成线,若干块面决定后,逐次推衍,从而完成全集的编次。朱先生曾说,他的研究方法与传统考据完全不同,是从点的考订到面的确认,如同剥树皮一样地完成全集的编年。“细节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相信大方向是正确的,方法也是科学的。”



这一探索,为后人从事唐宋文集的编年校订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学术普及方面,朱先生有《左传选》、《陆游诗选》、《梅尧臣诗选》等著作。

传记重真实,论文务专精

朱先生早年留学英国时,因读鲍斯威尔的名著《约翰逊博士传》而对传记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1939年后,因痛感国内研究创作的落后,“决定替中国的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他广泛阅读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各种著名传记与相关理论著作,将传记定义为结合史学与文学的特性而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将刻画和再现人物的丰富性格作为它的主要目标。

朱先生最初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撰述《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一书,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就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清理。从文献辑佚开始本书的写作,从汉唐之间史乘、类书、古注之类典籍中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作品,为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古籍辑佚是一项辛苦而枯燥的工作,当时在后方图书和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难,先生依然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以坚韧的意志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对于学术庄重严谨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则以亲身的实践履行其主张,于1943年写作完成了被认为中国传记文学奠基之著的《张居正大传》。张居正是明代万历初期的首辅,是历史上有巨大成就也有很大争议的政治人物。朱先生认为要对他作出评价,必须了解他一生的事功及其取得的途径,要了解他在与皇帝、权宦以及群僚之间错综复杂关系中,如何倾注心力而为国家服务。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传

记或以歌颂为主,或以褒贬为要,都不足为训,梁启超写的传记将传主分开评述,“大卸八块”,也不妥当。他特别赞赏英国近代传记文学的写法,“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即一切事实都应该经过详尽繁复的考证,但形成的作品则力求生动活泼。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朱先生认为学者要善于利用各类文献,但同时又要注意任何文献都有其局限性,史传的局限众所周知,西方学者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简、著作,以及中国的自撰年谱一类,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先生认为,优秀的传叙家应该善于分析和驾驭各类文献,努力追寻事实的真相,“把一切伪造无稽的故事删除,把一切真凭实据的故事收进”。学者不仅要有贯通文献的学力,同时应有辨析人事、体悟情委的悟性和胆识。保持这样的理念,他的传记写作注意对于大的时代背景的描述勾画,复原传主所生活的历史情境,进而能够对传主的性格特征加以生动的摹画,对其一生事功成就及历史局限做出公允的评论。文字气魄宏大,波澜壮阔,议论警辟刻骨,引人入胜。

朱先生常说,他的传记文学写作目标是为中国文学研究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他认为中国文学在引入西方文学观念后,在小说、诗歌、散文、戏曲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但传记方面则很不够。因此,他的后生将此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先后写作了《王阳明大传》(稿佚)、《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以及自传和夫人的传记。他所挑选的历史上的传主,都是积极用世,曾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个人努力的人士(元好问情况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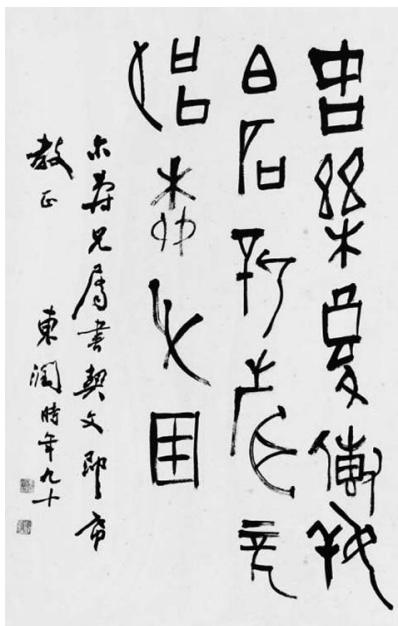
别),在这些人物身上较多地投入了朱先生本人的人生态度,他也经常谈到士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在《张居正大传》最后写到:

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底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底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底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是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底儿女!

这段写在抗战最困难时期的话,正体现了朱先生写作传记为先人总结荣光,为今人树立典范的用心。

书法斥姿媚,运斤独老成

朱先生的书法气势雄浑,风格高古,为学者



和书家所珍重。2005年12月,泰兴市为纪念他诞辰110周年,曾举办全国书法征集展览,海内书家纷纷献书,盛况空前。

其实,先生之学书始于年轻时的一段特殊经历。当时,他敬重的老师朱叔子先生谢世,悲痛至极,作挽联致悼,但以拙于书而不能自成,只好倩人代笔。自感惭愧,于是立志学书,并制定目标,准备以二十年学篆书,二十年学隶书,再以二十年学行草书,以期晚年有所成就。自此以还,无论学习工作多忙,他始终坚持每日临池习书,至老不休,终得有所成就。他的书法,从秦篆《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峰山碑》等入手,三十以后转而习隶书,于汉碑临习殆遍。五十以后,方觉得“于篆隶略有认识”,逐渐转习行草,尤重视李邕和孙过庭的作品。这样坚持数十年,终能融通各体,自成一家。曾有人提出疑问:“人生几何,岂能为一艺之成耗费数十年光阴?再说人寿岂可自期,倘天不永年,你这课程将何以完成?”朱先生回答:“学贵有本,书法亦然,循序渐进,乃唯一门径。非敢以此骇俗,我是笨人,舍此无由入门。倘天不假年,则只为人寿有亏,非学书之失败。何况没有学成而死,和不学而死,结果是一样的,并为损失什么,那又为什么不学呢?”从学书途径说到人生哲理,其实对于任何一门技艺的成功都有借鉴意义。

复旦书法家潘良桢先生评价朱先生的书法成就时说,他习篆弃大篆而就小篆,“目的在摆脱近人强烈个性的诱惑和束缚,独立思考,不受时尚左右”。“入手先求匀整,下笔着意干净,以得中锋圆净为目标”。他的行草“于沉着中见飘逸,其生辣老苍的韵致和劲健的篆籀之气,显示一派大家风范。用笔过人之处,尤在笔笔扎实



老到,却有飞动流转之势”。(《真积力久 学至乎没——朱东润先生及其书法》)

擘划开新面,栽培输赤诚

朱先生从事教育工作超过七十年,桃李遍布天下,视教学研究工作为一生的志业。晚年身体日衰、屡次住院后,依然工作不懈,以“教师终于讲席”自励。1987年12月,先生在月初完成了《元好问传》,18日完成博士生李祥年的答辩,20日最后一次因病住院,在医院与探视的学生谈话,仍然以学者要用于承担责任来勉励,可谓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于学问、事业的执着与坚持,感动了认识他的每一个人。

从1957年初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到1981年去职,朱先生在这个职位工作时间长达25年(文革期间靠边)。他为中文系的学生教育和师资培养倾注了许多心血。中文系许多教师都记得,朱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凡是中文系的会议,朱先生大多准时参加,每每登台讲话,无不高瞻远瞩,语重心长,经常是以相信我们这个系总会一直向前进来作结,给大家以很大鼓舞。他对学生的关怀也无微不至。现任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曾回忆,他做学生的时候,就遇到朱老晚上独自打着手电筒,到学生宿舍来探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当学生们得知眼前的老人已经八十多岁,无不为之动容。

朱先生待人宽厚,律己严格,在许多生活细节方面都很有讲究。他无论上课或参加会议,既不早到,也不迟到,每次都踩着点进门,他认为早到浪费自己时间,晚到浪费别人时间,都不妥当。他的作息和写作都有严格规定,生活有规律,每天限定写作字数,也曾传为美谈。他一

直保持传统士人的道德风操,平等待人,礼数待客,不屑权势,同情弱者。中文系许多普通教师都曾记得,当自己遇到苦闷不快时,是可以向老主任倾诉的。他对于来访的客人,区分远近亲疏,礼貌相待,初次来访或远道来访者,则常送到舍外。本系曾有某教授一度暴红,朱先生颇不以为意,但后来受到批判时,朱先生则大讲该教授的优点,且拒绝参与批判。正是这些细节,成就了先生人格的伟岸,也给同事和学生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楷模。

朱先生晚年担任了许多学术兼职或顾问,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中文学科组成员。据说当时江苏的两位学者钱仲联、任半塘申报硕士导师,朱先生认为他们的水平足以胜任,最后获得通过。他晚年指导研究生,始终坚持亲自授课,每次都讲足两个小时,为学生传授读书方法,让学生开拓眼界,还亲自为学生批改作业。他第一次授课,就讲读书首先要读通读董,但仅仅读通读董还远远不够,一定要读透,要读出文献里面蕴涵的内容,要力透纸背,才算会读书。朱先生的许多学生都卓然有成,是与他的指引分不开的。

朱先生是江苏泰兴人,他很关心地方的文教建设。晚年他得悉当地还没有图书馆,就将自己抗战前所置住宅捐赠地方。近年泰兴经济发展,建了新图书馆,特将旧居建为朱东润纪念馆,又将当地一条主干道命名为东润路,以为纪念。1996年和2006年,在朱先生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泰兴市政府分别举办隆重纪念会,追怀他为中国学术和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者按:2014年12月6日是朱东润先生118周年诞辰,由朱东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负责编撰的《朱东润文存》也于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存收录学术论文和诗文,凡八十万字,其中三分之二为首次结集,首次发表内容超过十五万字。



朱东润师文存的整理

□ 陈尚君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2月10日去世,至今已经二十六年,为先生编次文集的设想很早就已经提出,可惜一直未能落实。去年4月,与先生孙女朱邦薇、吴格夫妇到泰兴为先生扫墓,在先生墓前我们铭告要尽快完成这一工作,并很快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社长、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的积极支持,确定了基本原则和体例,并委托我负责具体的编纂事宜。朱邦薇女士提供了先生已刊未刊论著的文本和手稿,我也就自己的搜辑所得稍有补充。因公私多故,迁延到近日方得大致编定。

朱东润先生一生勤于著述,生前已出版论著逾二十种,内容涉及中国历代文学、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中年后肆力于传叙文学的研究和写作,成就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他的个人

存稿最早的有宣统年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一套考卷,今知最早出版的著作有早年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翻译小说《波兰遗恨录》《积雪东征集》等。虽然在抗战初期因任教的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以及“文革”期间书籍文稿曾被查抄,所幸除《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第三次定稿本下半部和四十年代后期所著《王阳明大传》手稿遗失外,一生论著大多得以完整保存。先生遗稿中有《遗远集叙录》一种,取《楚辞》“塞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意,总结自己到七十五岁为止的学术道路,并逐一点评除授课讲义外的所有论著。这份手稿大约撰写于1970年,是在“文革”特殊时期所写,当时虽然还看不到公开出版的希望,但先生相信未来会得到珍惜。据朱邦薇女士见告,先生“文革”初被籍没



的书稿,后来得到通知可以发还,那天是很高兴地用扁担挑着所有书稿回到家中。就目前看到先生存稿分析,大约就在此后不久,先生将存稿作了全面整理编次,并就已刊未刊各稿的基本内容和学术价值,写成这篇《遗远集叙录》。

根据与高克勤社长商定的意见,先生的专著将另刊为《朱东润学术著作集》,此次《文存》则收录单篇散见论著为主。我根据先生的存稿情况,参考先生自编《中国文学论集》和《遗远集叙录》,谨将《文存》分为六编,以《遗远集叙录》作为代自序列于全编之首。各部分之编录情况,谨说明如次。

第一编《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0年出版时,收入1931年至1935年间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所刊论文九篇。1983年作为上编收入《中国文学论集》。虽然在《遗远集叙录》中曾有编录《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之二》的设想,但因在《中国文学论集》已经有所改变,本次仅增附《论刘勰》和《〈沧浪诗话〉探故》两篇。

第二编《中国文学论集》。以1983年《中国文学论集》下编为主,增加发表稍晚的《杜诗的两个高峰》《宋话本研究》《〈水浒〉人名考》《〈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四篇。

第三编《传叙文学论集》。先生特别重视这部分文稿,存稿中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原刊论文的剪贴本装订一册、请人全抄本一册,以及晚年自写全本一份,包括十二篇论文,截止于六十年代初《漫谈传记文学》。本次保存了原编次,并增加八十年代发表的四篇有关文章。

第四编《楚辞探故》。先生从1950年秋到1951年1月研究《楚辞》,成文四篇,叶圣陶先生见到后,交给《光明日报》副刊在1951年3月至5

月间陆续刊出,引致学术界哗然。由郭沫若领衔在同一副刊发表五篇文章加以反驳。先生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认为“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朱东润自传》351页)但当时还是补写两文,均不取反驳论战的态度。先生当年曾告我,已经将自己的论文和批判的五篇文章编集,因郭去世而作罢。本次首度完整收录先生的六篇论文,并附录稍后所写学术普及文章一篇。

第五编《文学杂论及其他》。这部分先生的自定稿,包括十二篇文章,含四十年代所写文学散论六篇、时政杂谈三篇和现代诗文书评两篇,以1959年所写《现实主义是在什么时代成熟的》为殿。本次编录时增加早年译序两篇、《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印本题记、论诗教及读《诗》方法两篇、八十年代所作书评一篇、书序五篇,以及晚年谈书法的文章三篇等。先生从二十一岁开始习书,从篆书开始,再隶书,再行草,卓然名家,但谈书法论文公开发表者不多。本次从先生未刊文稿(主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书法讲座准备的讲义)中整理出三篇,希望能保存先生的一些见解。

第六编《师友琅琊馆杂著》。先生在《遗远集叙录》中称为《杂诗文》,“共分四部份:一、诗。二、词。三、文言文。四、现代文。”在自定文本中采取本编所题。诗词得见三份手稿。一份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自写本,上册自存,下册存江苏泰兴故居,收诗止于1933年。二为诗词合抄本,止于1951年所作《老去》,对早期诗作作了严格的去取和部分的改写。其三为诗词分抄本,诗的部分在前本基础上,增诗十八首,止于1961年西北之行期间所作诗,应是上世纪六十



年代前中期写定。先生曾与我谈唐诗,认为只有一半是值得流传后世的,他对自己作品当也持如此态度。为保留先生本人的遴选去取,同时又尽可能保存今所得见的先生全部诗作,谨以上述第三本增加《九十》一首,编为《师友琅琊馆诗存》;以第一本保存的其他诗,和本次编录时从各种途径得到的诗什,编为《师友琅琊馆诗辑》。其他三编,均依先生自己编定者,仅现代文部分据手稿增加了《我从泰兴来》《我在泰兴求学》和《我的写作生活》三篇。

最后,我还想就先生所存遗稿情况稍作说明。先生去世后,已经依据遗稿整理出版了《李方舟传》《元好问传》《朱东润自传》(原题《八十年》)《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等专著。目前未经整理的遗稿尚有1939年所著《传叙文学述论》以及一些讲义,包括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授课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四种、1961年在复旦大学授课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上世纪五十年代讲授文学史、宋元文学的讲义,以及八十年代给研究生授课的传记文学讲义。就先生本人的态度来说,他认为讲义“必须采用一般人共同接受的看法,但是教书的却必须把自己所得到的一点认识交给学生”。因此一般并不主张公开发表讲义。这些讲义当然是先生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记录,是否有必要整理则尚有待评估。此外,先生早年的翻译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骠骑父子》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波兰遗恨录》《积雪东征录》等,也有待另外辑校。

因为本次较完整地清理先生遗稿,对已经出版整理的著作也会作一些新的补充。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目前通行本是以1937

年增订本的上半部和1933年讲义的下半部拼合而成,是战争在学术著作中留下的惨痛痕迹。在先生遗稿中已经发现1937年增订本下半部最后十八章的手稿(详见《复旦学报》2013年6期拙文《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今后拟考虑出新的增订本。另《汉书考索》1996年整理时,没有发现先生别存的《班彪〈汉书〉》《越民族底灭亡》二文,也容今后补入。《元好问传》为先生最后遗稿,亦拟重新整理,与已刊本颇有增益。

1986年,在先生生病入院康复后,我曾询问先生可有以往文稿整理需要我尽力的,当时年轻不懂事,大约说到要抓紧时间的话,先生答:“那也不需要等很长时间了。”我才明白自己的失言。今天有机会整理先生的遗著,略尽学生的责任,在我是莫大的光荣。重新通读先生的学术见解,当年听闻先生的授课感到困惑而没有完全理解的内容,得以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更感受到先生人格和学问的博大。

以上所述《文存》编次的安排和调整,是否妥当,殊无把握,希望听取对先生有更多了解的诸师友的教言。《文存》所收各文,一概根据先生手稿或发表之文本编录,除少数标点的改动、引文复核校三改,以及抄写校排时的明显讹误改正外,一律保持原稿的内容。极个别原稿不尽能理解但又无从校改者,只能仍存原貌。高克勤社长亲自担任本书责编,刘赛先生为此付出许多辛勤劳动,也在此表示感谢。本人为学识所限,加上为各种琐事困扰,投入精力不足,整理中的错误偏失恐在所难免,也希望方家给以指点。



朱东润先生的精神与境界

□ 王水照

今天我们来纪念朱东润先生,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朱老一生事业的缅怀,对他品德和学问的仰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宏扬,对知识分子优秀人格的尊奉。

记得钱钟书先生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郭朱二老,当代耆硕,学问笃实,亦京华冠盖中所无也。”他说的“郭朱二老”,就是指朱老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另一位大学者郭绍虞先生。钱先生不太轻易称许别人,他对朱老的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朱老在他长达九十多年的生活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这是他一生永不停歇、辛勤耕耘的结果,朱老生前常爱说两句话:一句是梁启超的“战士死于疆场,教师死于讲席”;一句是“我们必须前进,永远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他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信念。我觉得,朱老身上这种永不满足、充满生命活力的进取精神,是最可宝贵的。从他早年登上学术之坛起,直至晚年,除因外力所迫搁笔以外,他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特别是九十多高龄犹能撰写几十万言的《元好问传》,这在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罕见的。

记得1987年夏天,朱老病重住长海医院时,我和另一位先生去看他,他谈起正在写作的《元好问传》,谈起元好问的时代,谈起对北宋九帝、南宋九帝的评议,谈着谈着,他突然说:“我真不想死!”我至今忘不了他说这句话时的严肃神情和炯炯目光。这是把生命献给祖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庄严誓言。这种热爱甚至到了近乎痴心的境地,这深深地感动着我。

朱老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数十年一贯的学术热情和进取精神,取决于他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十分深刻的历史感,又有十分清醒的时代意识。他把认真吸取、勇于借鉴历史经验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读他的著作,总为他广阔的历史视野所折服,同时又能感受到现实的生活气息,且两者水乳交融,而非生搬乱套。他写了近十部传记著作,如他的成名作《张居正大传》,从1943年问世以来,为中国的新型的传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此书直到现在仍不断再版。朱老在写张居正传以后,还写了杜甫、梅尧臣、陆游、陈子龙、王阳明等古代人物的传记。这些传主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大都是对国家、民族作出各种不同贡献的人物,朱老特别表彰他们的气

节、风骨以及济世救时的涉世热忱。他还写过他夫人的《李方舟传》,在文革中他还曾想替一位女生产队长立传,目的则是从普通平凡的人物中发掘品德之美和人性之美。

朱老的传记文学有一大特点,总是在时代、历史的大背景中展示传主的事功建树和内心世界。如他写陈子龙传记,以《陈子龙及其时代》为书名,但同时又具强烈的现实性,处处显示出一个现代人对历史的思考和眼力。这就使他的著作呈现出气度恢宏、高屋建瓴、用笔雄放的风格,斤斤于一事一隅者很难望其项背。他虽年高而无迂腐气,思想敏锐,充满朝气。此外,与他的传记创作相表里,他的传记理论研究,如《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传记文学与人格》《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也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传记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常常遵循“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的古训,也就是说,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造的建树融为一体。朱老的一生,是这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美统一的模范。

高山仰止,宗师长在,朱老将继续培育、激励我们。

【作者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一身傲骨朱东润

□ 佚名

朱东润常言：“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不只是说说而已。文革初期，朱东润是复旦大学第一批被揪出来批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过他的回答则是：“我嘛，‘权威’勉强算一个，‘反动’嘛，则未必。”随着批斗逐渐升级，朱东润遭遇的折磨亦更加厉害。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头头率领几个红卫兵来抓朱东润“杀头”示众，他们找到一把日本战刀，两人揪头压肩，两人用军刀当锯子拉颈项。幸亏战刀年久生锈，头才没掉下来。他们还恶狠狠地问：“你是什么东西？”他们原以为这次朱东润一定会求饶，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反动分子。不料，朱东润却昂然抬头说道：“我是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是如此坚贞不屈，以至于当时批斗者中有人喊“砸朱东润的傲骨”。

朱东润一身傲骨，自信且自负，在复旦是出

了名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曾转述过一个有关朱东润先生的故事，说的是朱先生曾作学术报告谈传记文学，认为世界上只有三部传记作品是值得读的，一部是英国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一部是法国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还有一部就是他自己的《张居正大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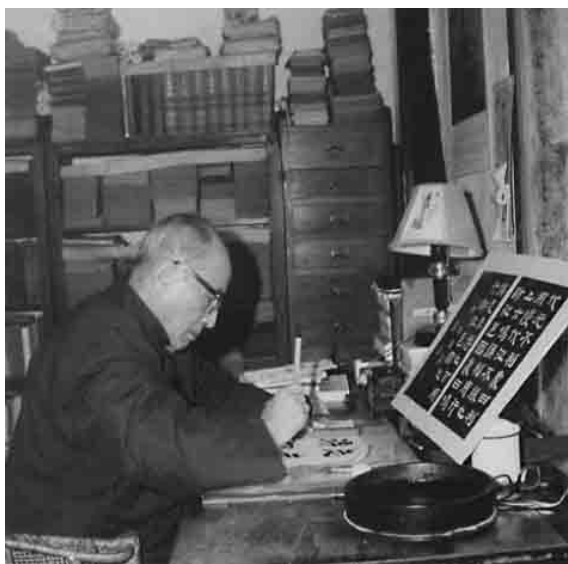
朱东润完全有理由如此自负，因为他是我国公认的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他把自己的《张居正大传》列为世上最好的三部传记作品之一，而世人则赞誉《张居正大传》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除了《张居正大传》外，朱东润一生还有著有《陈子龙及其时代》《杜甫叙论》《陆游传》《梅尧臣传》《李方舟传》《元好问传》等。

朱东润在开创现代传记文学写作体例时，曾强调，除了文学性，传记文学首要的是真实。他说：“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



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原则,在他的第一部传记作品《张居正大传》中得到了坚决贯彻,所有的事实,都经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证”。

72岁那年,朱东润却完全违背了自己曾经定下的传记文学标准,他竟然把洋洋洒洒一篇大作,献给了一个虚构的名叫“李方舟”的平凡女子。不过,批评家并没有就此责难他。因为,这是一本献给他爱妻的作品。当朱东润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后,他的妻子邹莲舫女士因不堪精神与疾病的双重折磨自杀身亡。朱东润把对这名温柔贤淑、刚强果断、为丈夫和子女奉献了一生的家庭妇女的思念,寄托于“李方舟”。他在《李方舟传》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朱东润先生伏案临帖

向前进,道路是曲折的,光明依然在前。朱东润对此深信不疑。他在抗战困难时期完成的《张居正大传》一书最后写道: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时,总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赫一些,有的暗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是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历经清王朝的覆灭、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等政局的变迁,朱东润始终向往光明,执著进步。1979年,已至耄耋之年的朱东润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做到了“永远前进”。上世纪80年代批判周扬时,报社记者问及他对周扬的评价以及对异化问题的看法,朱东润的回答总是那么一句:“我活到现在90岁了,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朱东润曾希望人们在他死后能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如此足矣。不过,在他逝世后,世人对他的评价是:朱东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和书法家。

(选自《中青亮点》)



让胡适惭愧的丁文江

□ 魏邦良

丁文江曾说,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胡适赞叹: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是丁在君的人生观。

丁文江科学人生观最早应始于英国留学期间。当时,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主修动物学,辅修地质学。因为常呆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就这样慢慢形成。丁文江注重实地考察,他曾在日记里记下他徒步考察的习惯:

“我每天的习惯,一天亮起来就吃早饭,吃完了就先带着一个向导,一个背夫,独自一个上路。铺盖、帐篷、书籍、标本,用八个牲口驮着,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再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将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篷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铺铺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某年冬天,丁文江觉得左脚大拇指经常发麻,他去协和医院问医生:“要紧不要紧?”医生答:“大概不要紧。”丁文江再问:“能治不能治?”医生:“不能治。”丁文江听了医生的话,立刻放

心走了。他后来对朋友说:“若是能治,当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从此不想它好了。”

丁文江对疾病的这种态度,最为科学,有病就治,既不能治,就坦然面对。

1926年5月至12月,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这段经历,让他的声名蒙上一层阴影。其实,丁文江顶着压力,不惜牺牲羽毛,出任淞沪督办,是想“趁早替国家做点事”。

丁文江担任淞沪督办的时间很短。他的办事能力更多的不是体现在政治而是其他领域:比如,创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和地质调查所,造就了许多地质学的台柱子;比如,整顿了中央研究院,使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在和胡适的交往中,丁文江的敬业、热忱、勤勉每每令胡适赞叹不已而又自愧不如。

丁文江接受淞沪总办之职时,每天接到不少荐书,他就让秘书将其归类,等他正式上任后,根据职位的需要,写信通知求职者来接受考试,一旦合格,马上录取;不及格的,他也去信说明。——他的勤勉给当时人在上海的胡适留下很深的印象。

和胡适相比,丁文江对学生对教书育人更投入更热心: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每谈起他的学生如何用功,他真眉飞色舞。他对他班上的学生某人天资如何,某人功力如何,



都记得清楚。

对此,胡适面有赧色,说:“我对他常感觉惭愧。”

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也让胡适自觉惭愧。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很强的“宗教心”,即指他特别富有牺牲精神。丁文江的“牺牲”精神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为家庭做出牺牲。丁文江26岁自英国回来后,他的收入完全用来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26岁到48岁这22年间,他每年支付给舅舅500元赡养费;每年资助一位贫困兄弟300元。

为社会做出牺牲。丁文江的弟弟丁文渊求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批评他道:“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丁文江回信中再次对弟弟晓之以理:

“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

胡适和丁文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他说:“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有

段时间,胡适身体不好,丁文江写信劝他出国休养,劝的次数多了,胡适甚至有些厌烦了。

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就开戒了。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身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酒。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1931年,丁文江一家在秦皇岛租了一所房子消夏。丁文江挂念胡适,就写了一首诗邀请胡适来此度假。两天后,胡适带着儿子祖望到秦皇岛,和丁文江一家度过十天快乐时光。临别前夕,二人彻夜交谈,最后共同背诵元微之送白居易的两首绝句尽情倾诉惜别之情。

四年半后,丁文江因煤气中毒死在长沙。噩耗传来,胡适悲从中来,情难自禁,也步元微之原韵写了两首诗悼念这位一直牵挂自己的朋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1956年是丁文江逝世20周年。那一年,胡适已年满65岁,但他不顾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写了一本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传记》。这是胡适篇幅最长、用力最深的一本书。

胡适用这本传世之作,表达了他对丁文江诚挚的谢意、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悼念之情。

(原载《科技日报》2012年10月17日)



鸿臚寺主簿 何嵩

□ 何正元

2014年4月,一则题为“泰兴明代古墓重见天日,530年前古尸不腐,皮肤完整,胡须不落”的新闻轰动全国,人们在关注尸身不腐的奇迹时,也在探究墓主人的身世。据多方考证,墓主人的身份已有定论,他就是当地望族“泰兴何氏”九世孙何嵩。

何嵩生于宣德戊申年(1428),卒于成化甲辰年(1484),享年56岁。虽无科举功名,但因才貌双全被荐为鸿臚寺序班,后升为主簿。卒后十五年因儿子何樟显贵,被追赠为正七品应天府推官。

何嵩系泰兴何氏始迁祖孔庭公九世孙。泰兴何氏源自庐江,迁江苏始祖之元公为何庶之世孙,庐江濡山人。之元公生年不详,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官至湘州刺史,晚年隐居晋陵(常州)何墅,著有《梁典》三十卷。

泰兴何氏始迁祖孔庭公为之元公之二十六世孙,南宋年间,因屡遭兵患之灾,避居泰兴之黄桥,以耕读为业,以儒学传家,行善积德,睦邻孝悌。遂为泰兴之望族。

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泰兴何氏的先祖们,读书不为入仕,只为做人。二世祖处恭公,悻行孝弟,为人谦恭,勤俭治家。当时土地虽多,但良田不富,他竟以膏腴负郭之地墓亲,为世人所称颂,且纷纷效之。到三世承事公时,家业益昌。四世敬达公不但本性勤俭,且天性温顺恭谨,喜读书,知大义,利物为心,恒以济人。经过百年多的积淀之后,六世祖彦清公笃于孝友,

以忠信饬行,以勤俭治家,家境更加丰裕。但他不以财恃傲,不以富贱贫。有人因急用而卖田者,他都给以双倍的价格。有人借贷不能偿还者,焚其借券而不计。到了七世祖何济时,几代人的积德行善更是达到了顶峰。

何济(1373-1451),字伯舟,号体素。自幼聪敏,喜读书,尤喜内典(佛经),常把劝人为善、有益道德修养的话,摘抄授人,身体力行,散德乡里。“闻人丧事不举则助之,见人婚礼不备则周之,乐施之心久而不替,尚友之义老而弥笃”。他一生还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奉诏命次子頔富实京师,尽忠益族。二是巨资赈灾,获得英宗皇帝褒奖,敕封为义士,并建坊以旌其淑,奠定了何氏家族的社会地位,树立了何氏家族的公众形象,为何氏后人树立了道德榜样。三是制定了《何氏家范》,规范了何氏族人治家立业、为人处世的道德行为准则。故自何济后,明清两朝,泰兴何氏出了四进士、十举人、三十二贡生、三百多秀才,簪缨接踵,印累累,绶若若,在泰兴地区为鼎族之家,享有“头顶何字值千金之美誉”!清朝宰相张玉书题泰兴何氏为“江左甲族”。

何济虽无功名官爵,但被邑人奉为大宾,谥以时政,众人一词曰:尚义旌坊,名副其实。何济兄弟三人,长兄洪,生一子颢;次兄淇,早卒;济生有三子,一曰颢,二曰頔,三曰頌。三子生十一孙:幽、崇、岩、岫、岳、峦、嵩、岷、崙、岱、岐。因兄子颢无后,以頔三子嵩嗣之。



何嵩为何济之孙,在这样的家族文化的熏陶和培养下,何嵩自然不凡。

何嵩身材高大,貌美体丰,衣着讲究,自幼嗜书好学,学务博览。尤熟于史,上下数千载,事能记忆不遗。内秀外溢,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何嵩虽有才有貌,但不事功名。开始随祖父伯舟住,“力事农业”且“岁收获倍”。他常来往于京师间,其容貌气质,学识礼仪,被时任少保东阁大学士高谷赏识,欲荐入朝,被嵩力辞。

何嵩辞荐高公后,又被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竑、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王恕所识。二公谈及人才,必提及何嵩。二公认为,扬州郡内论人才,非何嵩莫及。在巡行所主之县时,二公专程登门造访,相互以礼相待,后何嵩再入京师时,竟由吏部尚书姚夔所荐,入朝授鸿臚寺序班,后升主簿(正八品),成化庚寅(1470)年因嗣父叔明公卒,去职丧祭。成化癸卯(1483)因嗣母孙老,上疏乞归,半道孙卒,兼程抵家,悲劳成疾,成化甲辰年(1484)病卒,成化乙巳年(1485)入土安葬,弘治十二年(1499)因子樟(音:伟)贵,追封为应天府推官。

何嵩嗣父颢,敕赐七品散、官階承事郎;从弟岷,敕赐文林郎、晋赠承德郎、礼部主事、中顺大夫;从弟岱,以贡生授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敕赠监察御史。其子侄二十五人中,两个进士、两个举人、两个贡生、还有一个秀才。其子樟成化庚子科举人,敕授儒林郎、应天府推官;侄棐、棠为弘治辛酉科同榜举人,分别为弘治壬戌、正德辛未科进士。棐官至太仆寺少卿、按察司副使,因政绩卓著,行谊可范敕建四牌坊予以旌表;棠敕授承德郎、广平知府、晋中顺大夫,加一级从三品俸;桐正德丙子科举人;栗任浙江定海

县主簿;果任直隶沧洲通判。其从孙也多有建树,职銜者众。在当时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何氏家族取得如此丰硕的科举功名,令人称奇。

何嵩的墓葬位于黄桥西郊一公里的戴家堡,原有墓地数十亩,地表有石碑、石雕、牌坊、花岗岩墓道等建筑,因年代久远,加之时代变迁地形变化,地表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当地住民包括何氏后裔也很少有人知道此墓葬的存在。黄桥在房地产开发时发现了此墓葬,后经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历经两个多月的挖掘考证,根据出土的墓志铭墓碑及何氏家族提供的文字记载,确认为何嵩墓。

何嵩墓为浇浆墓,密封程度好,打开棺槨后不但尸身未腐,且皮肤完整,眉毛、胡须、指甲保存完好。棉布、丝绸做的长袍、夹袄和裤子等衣物,韧性、颜色如新,衣扣能解,就连尸下纸钱都可以整沓取出。何嵩官职不是很高,但如此葬制,当年何氏家族的富有可见一斑。

现在,泰兴何氏在黄桥镇足有三万人之多。何嵩的直系后裔也颇为众多,何嵩生有四子,杰、樟、楫、楷。樟传至十六世后失传;楫继兄岳无传;杰、楷两支,现主要集居在黄桥东西两郊,也有迁至外省或其它乡、镇、县、市的。

何嵩一身淡泊名利,为人低调,就是在朝为官,由序班升为主簿,也是“默默非所乐也”,但却为当朝诸名臣所器重。他布衣入仕,行状为当朝进士吏部左侍郎官至三品的储巏所作;墓表为当朝重臣、文学家、书法家、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撰,进士、工部主事黄暉书篆;墓志铭为明代诗人、书画家、礼部尚书吴宽所撰,当朝江南才子著名书法家浦应祥书丹题盖。其为人可知也。



悄然走过的

葛醒楼

□ 叶子

捧读《泰兴馆藏书画》集,品味内中那幅民国总统徐世昌书赠醒楼先生的“池风有毛皆五色,蕊珠无树不三花”楷书对联,如同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从路旁的小巷中悄然走来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的旧式人物,让人们再一次看见了葛醒楼这个曾经闻名遐迩的身影。

葛醒楼,号梦朴,1874年出生于泰兴城,190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警视厅警察学校暨私立日本大学专门法律科。回国后,被看重留洋经历的苏常道推选为国会议员,曾赴北京参加了民国初期选举总统的会议。葛醒楼声名之显赫,在现今泰兴城内70岁以上的老人中,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当年,葛醒楼长袖善舞,以雄辩闻名于官场、商界,是南通、苏州有名的大律师。他在泰兴的所作所为,民间也有多种传说。有说他赌气开“第一池”浴室的,也有说他想收购前熊王巷土地,建造自家园林的,还有说他想建造一条葛家巷的。然而,《泰兴馆藏书画》的出版,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书画收藏大家的身影。据说,现存泰兴博物馆的600多幅古字画中,竟有近十分之一来自葛醒楼家。

现年86岁的葛普生是醒楼先生的长孙,据他介绍这支葛姓在泰兴共有五房,他家是老五房。葛氏诗书传家,醒楼天资聪颖,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留学回国后以律师为职业。醒楼为人正直善良,生性豪爽,很有仗义疏财的侠士风骨。每当穷苦人上门求救,他都不计报酬,全力以赴打赢官司。随着名声传扬,业务越来越多,朋友越交越广。后来,他为了勉励和鞭策自己,又取了“行侠”这个号,以不忘扶贫助弱,伸张正义。醒楼一生喜爱书画,几近痴迷,每有余暇,便多方求索,一旦遇上自己特别喜欢的,更是不惜重金求购。

在葛普生的记忆中,坊间所传醒楼开浴室,想收购前熊王巷建自家宅院确有其事。这主要是因他手中有了钱。后来,收购前熊王巷的计划落了空,但建成的一座拥有亭台楼阁,50多间房屋,建筑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的葛家大



院。解放后，葛家大院一度成为泰兴镇政府驻地，后又成为全镇的敬老院，平心而论，醒楼先生也算为后人做了一件好事。

葛普生印象最深的，葛家除存有一块长1.2米，宽30公分，当年挂在苏州律师事务所大门前的“葛梦朴大律师”木牌外，余多为各种字画，客厅和房间都挂得满满的，还装有好几大木箱。每到夏天时，都要拿出来晒伏，天井里摆得满地都是。这些名人字画中，不乏郑孝胥、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作品。家中宅院东侧花园上的“邃庐”二字，就是醒楼花重金请郑孝胥题写的。1929年醒楼先生去世后，葛氏后人传承了醒楼先生收藏书画之喜好，有四件轶事葛普生至今记忆犹新。其一，抗战爆发后，葛氏将家中所存字画分为三等，一等的装进一只专门钉制的大樟木箱内，砌进夹墙里；二等的放进一只大木柜中，与杂物堆放在一起；三等的作为点缀，挂在室内的墙上。其二，葛氏收藏的一幅陈潮篆书帖，因上门求索和收购的人太多，为让更多人欣赏，葛氏曾出巨资，到上海找印刷厂制成珂罗版送人，数量在二十张左右，后市面上流行的大都是这种珂罗版，并非原真迹，而真正的原稿后来在“文革”中焚毁。其三，葛氏除收藏有前文所述徐世昌的对联外，还曾收藏有一幅民国总统黎元洪赠给葛醒楼的字。其四，抗战期间驻靖江的日军指挥官曾由伪十九师师长蔡鑫元引路，到他家强行索取了一幅题为《芦鸿》的国画，作者为边寿民。

因为年代久远，加之葛普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就离家参军入伍，全国解放时，又随军进入大西南，故葛家收藏字画的去向，他也不大清楚。据说，解放初期，泰兴市政协曾在鼓楼北街襟江巷头开设了一爿字画店，专门收购散落在社会上的各种名人字画。葛家的部分收藏很可能经由这里出售或收藏。倘若真是如此，政协可算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后来，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家人为躲避抄家，将所存字画作柴禾扔进炉膛，整整烧熟了两大锅饭。若照此推算，大概也有上千件书画化为乌有。

现在，《泰兴馆藏书画》收录的这幅民国总统徐世昌书赠醒楼先生的楷书对联，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葛醒楼的身影。通过这位钟情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有心人，我们对家乡的人文风情和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



故国情怀莲社贤

——记诗僧休隐上人

□ 曹 韵

改朝换代的剧痛，必然会在文人心中产生巨大的心灵震荡，而明清易代之际，更多一层夷夏之别，成为不少士人心中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泰兴，也有部分不肯屈从清廷统治的倔强仕子，举人王中美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光绪泰兴县志》中《人物志列传》介绍王令树时有这样一段叙述：“大父王尊美，明诸生，与其兄举人中美同都雋望，世变不出，未竟其才。”大父，即祖父，王尊美为王令树祖父。王尊美兄弟三人，中美为其兄，开美为其弟。“雋”通“俊”，才智出众之意。秀才王尊美和他的举人哥哥，兄弟二人遭遇改朝换代，忠于明王朝，不肯出来做官，没有得到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这是正史上对王中美唯一的记载。

家谱上则说：“王中美，字四畅，号美发，才质粹美。崇祯八年拔贡，崇祯十二年己卯科九十八名举人，勅授文林郎、候选知县。”

家谱上没有王中美的生歿时间，只有王尊

美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歿于康熙十八年(1679)，寿六十七岁的记载，据此推算，王中美当生于1611年前后，张丕扬有《寿休隐上人七十》诗，去世时间当在康熙十八年后，后于其弟尊美。

家谱上还说：“公素性恬澹，不乐仕进，己卯乡荐后，值国势沛，即绝意春闱，家居教子，一以经明行修为务，间与邑中知己论古今兴废，饮酒赋诗，以此自终。”

由此可知，王中美崇祯十二年(1639)考中举人后，明王朝于崇祯十三年、崇祯十五年、崇祯十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但当时朝廷昏庸，天下大乱，王中美故“绝意春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春闱”即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中央级科举考试，称会试，因考试在春天举行，故叫“春试”，又叫“春闱”。明代会试农历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共考三场，每场考三天，共九天，参考者为各省举人，淘汰制，考中者称贡士，然后



参加只决定名次的殿试，称进士。至此，年方三十的举人，一心一意在家课子、饮酒赋诗以终。

事实真是如此吗？拨开历史的迷雾，真相逐渐显露，原来王中美就是泰兴庆云寺下院的高僧“休隐上人”，是一位思想深刻，始终未忘旧国故主，拒绝出仕“新朝”，而又才华横溢的遗民诗僧，时代的动荡、禅悦之风的盛行、“异端”思想的崛起，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铸就了他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

笔者对王中美即休隐上人的发现，始于对泰兴康熙朝著名诗人张丕扬的研究。

张丕扬为清代康熙朝泰兴著名诗人，有《木田诗钞》八卷传世。清初号称“领袖诗坛”的王士禛曾于江都顾图河（张丕扬亲家）家中看到张丕扬的诗，“赏叹不止”，给予很高的评价，“其词之清和纯粹，独步一时”（《木田诗钞》序）。张丕扬的《木田诗钞》中提到多位泰兴高僧，如休隐上人、天涛上人、润桓上人、旦幢上人、德溥等。

休隐上人是张丕扬甘以晚辈自居，且评价最高的一位。虽然我们无法一睹其诗的风采，但从张丕扬《次韵答休隐上人》中可窥一斑：

西来知大意，兔角与龟毛，得得声名籍，非非见地高。

祇园推智果，莲社负诗豪，齐贯吟成后，词臣也解袍。

既是“次韵”，必是作为长辈的“休隐上人”先写有一诗，然后由晚辈张丕扬“次”休隐上人的原韵另写一首诗。从张丕扬的这首“次韵”诗中可以了解到，这位孤寂地居住在庆云寺下院“阇经”的高僧，是一位水平非常高的遗民诗人，

尽管此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出家以前的功名和官职，但他作为“莲社”成员的身份，就足以证明其非同一般。

莲社是汇集在苏州灵岩山的一大批诗僧的群体，都是“昔在朝端今凤麟，后归法苑称龙象”的人物。能够参加莲社与这些知名人物一起结社吟诗，决非无名之辈。故张丕扬称休隐是“得得声名籍，非非见地高”的“诗豪”，是“兔角与龟毛”这样不可多得的“智果”，称他的诗“齐贯吟成后，词臣也解袍”。

真正使王中美露出庐山真面目的，是张丕扬在休隐上人七十大寿时，所作的《寿休隐上人七十》诗：

瓢笠逍遥七十年，岿然禅伯亦诗仙。

惠休人识汤公号，清昼名因谢氏传。（师俗姓王，为邑华胄。）

白社青溪成久要，三车双树有真诠。

知君妙解穷年理，为诵南华第二篇。

“瓢笠”，瓢，此处应作饮食简朴；笠，用竹篾编的帽子，此处应作衣着朴素。瓢笠可译作俭朴的生活。“岿然禅伯亦诗仙”则突出了休隐上人的气节、辈份和水平。更重要的是第二句后的附注：师俗姓王，为邑华胄。此两句说明了几个问题：休隐上人姓王，是泰兴本地人，他的家族是泰兴的大家族。仔细查阅泰兴县志和众多的王氏族谱，明末清初在泰兴称得上“华胄”的，只有王中美家族。在此时间段，王姓泰兴名人也只有王中美、王尊美兄弟和住在城南三十里曲水圩的名儒王三重。王三重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的后裔，虽说名气很大，但



他却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迁泰时间不长,且年龄不对。王三重七十岁时,张丕扬还是个十三四岁的童子,即使小有才华,也没有资格去为其祝寿。再联系参加莲社需要的资历,王三重为布衣,唯王中美符合条件。

从上述资料看,王中美家境殷实,纵然其“不乐仕进”,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居家不出,“大隐隐于市”,那他为什么会出家为僧呢?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一、晚明以来禅悦之风兴盛的影响。万历以后,高僧辈出。当时高官如汪可受、陶望龄、袁宏道、王元翰等咸执弟子礼。部分士大夫文人醉心于习禅礼佛,静坐焚香,交结僧人。一时之间,禅悦之风大为流行。明社会的腐败使文人们醉心于禅学。清初沿袭晚明余风,文人士大夫好佛蔚然成风。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东南一带佛教盛况空前。泰兴也不例外,王中美一家也深受禅悦之风的影响。王中美的父亲王嘉宾(1580-1642)是一名国子监生,但他生性好佛,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康熙二十七年(1688)泰兴县志》卷之四载:“放生庵,在北门外,明万历年建,监生王嘉宾施地;毘尼庵,在北门外,今改为福城禅院,亦王嘉宾施地。”王中美的后辈中也不乏佞佛之人,其侄孙王令树在城东隅的宅子里建有家庙,康熙皇帝赐给他的御书对联“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就挂在家庙中。康熙五十五年,王令树捨宅为观音禅寺。观音禅寺占地五庙,殿宇重叠,美轮金碧,三百年来,至今香火不断。

二、从明中叶开始,学术领域中哲学思想有了新的突破,王阳明心学公开抛弃辟佛的儒家原则,为士大夫文人与佛学的亲密接触提供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实现了儒佛的进一步融合。王艮是王阳明最优秀的学生,他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成为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王艮的后裔,与王中美同为泰兴名儒的王三重,迁居泰兴城南三十里的曲水圩后,“泰州学派”的思想理论在泰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王艮在承接王学传统的同时,又迎合并代表了禅、道、儒的世俗化、平民化及市民阶层利益的要求,主张“百姓日用即道”。同为王姓,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些对王中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为王中美成为诗僧提供了道德支撑和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

三、王中美所处的时代,以道德精神为旨归的程朱理学渐渐失去了昔日在思想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力,尤其身处黑暗现实中的文人士大夫,尽管无力改变皇帝昏庸无能、纲纪败坏殆尽、官场险恶重重的社会,但“儒者使命”又使他们不愿放弃对现世的关怀,传统的社会道德遂内化为良心的自律,于是不得不寻求心学境界以摆脱环境的困扰、安顿自我生命,醉心于习禅礼佛,静坐焚香,隐居寺院佛堂,正所谓“释迦孔子,易地皆然。”(袁宏道语)

四、王中美出家,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剃发易服的羞辱。清初,在满族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对于王中美这样彷徨无路的遗民来说,禅门佛国成了他们逃避杀戮,不与清王朝合作的“天国”。剃发与否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风俗习惯的问题,满汉双方都把它理解成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事件。在满洲贵族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衣冠,就会断绝其归明之路,效忠清王朝;对汉族士人来说,剃发就意味着投降,就意味着对君父的背叛,意味



着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遗弃。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汉族士子的倔强和不肯屈从,采用的政策和手段也就格外的严酷。对于王中美来说,为免遭清廷迫害,在剃发与屠刀之间,选择出世之路——削发为僧,不失为一条全身避祸的上策,宁可自己主动遁入空门,皈依佛祖,也不愿留在尘世间人格受辱。这种消极而巧妙的反抗异族统治之举,也就自然成为明朝遗民王中美的首选。遁迹山林后,王中美法号“休隐”,人称休隐上人。

王中美入莲社后,并未长期留住僧舍,常往来家乡与灵岩,过上了忽僧忽儒,亦僧亦儒的生活,和大圆居士张有誉一样,“每乐与诸禅德谈出世事,沉酣内典,大有领悟。及持身处世,谓必当以孔子为师,如方园之有规矩。故入山不异缙流,而居家一循儒礼。”一方面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家,另一方面又与僧人往来不断,所以家谱上说他“家居教子,一以经明行修为务,间与邑中知己论古今兴废,饮酒赋诗。”这种出家方式,显然不是正规的宗教行为。只有在明末清初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在遗民社会才有其存在的可能,也才有可能被理解。

王中美出家后,与众多文人、方外之士仍保持广泛联系。我们从邓汉仪的《宿延令放生庵》中可见一斑:

困顿来江县,幽棲得此中。长桥穿竹路,层水抱花宫。

雪气春犹冻,鱼声夜有风。虚堂嗽粥罢,半偈问支公。

邓汉仪(1617-1689),字孝威,明末吴县诸生。少颖悟,博洽通敏,日读数千言,贯穿经史

百家之籍,并“工诗”,人称“骚雅领袖”。早年师从海宁举人查继佐,明末加入复社,为社中的青年才俊。顺治元年,为避身远祸,举家迁居泰州,从此绝意仕进,过着一种平静、淡泊的“出世”生活,“从容文史场”,“拥书走四方”,超然于纷争的尘俗之外,正如他自己诗中所写的:“十年亲酌曹溪水,我亦江湖破衲僧”(《历烈士招游天宁寺塔有感》)。邓汉仪来泰兴后“宿放生庵”,放生庵为王嘉宾所建,其时,王嘉宾已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去世,接待邓汉仪的理所当然的是王嘉宾的长子、休隐上人王中美。王中美虽然年长邓汉仪几岁,但他俩心有灵犀一点通,异族的入主、政权的更替给他俩的身心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产生深重的感情负担,传统的忠孝节烈观,又使他俩对故国有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关塞鼓鞞家已废,乾坤榛莽硯难耕”(《答爰琴》邓汉仪),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心心相印。饭后,邓汉仪“半偈问支公”。偈,即“偈语”,佛教中长篇大论之后,为了容易记忆所说佛法的主要精髓,将所说的内容归纳为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的语句,称“偈语”。因为偈语属于精髓的东西,而佛法难闻,没有什么善根福德的凡夫俗子,难以听到整个偈语,能听到半个偈语,就值得欢欣鼓舞了。所以,有“半偈”之说。“支公”即晋高僧支遁,字道林,其人“擅清谈”,是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邓汉仪把王中美比作擅清谈的支遁和尚,证明他与王中美的交谈中获益匪浅。

王中美的最后岁月是在佛寺度过的,因为他拒绝了清廷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

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平定了三藩之乱,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举行博学鸿



词科，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举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已仕未仕，是否有举人秀才资格，凡是被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参加考试，所试内容广泛，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朝廷一声令下，各地官员不遗余力。江苏学政张能麟发现了王中美这位前朝举人、本朝硕儒，于是，亲书“学窥理奥，品重圭璋”的匾额，挂到王中美家大门上。学政如此，知县大人也不甘落后，称赞王中美“名节自爱文行俱优，声称无间于孝友，履蹈必效乎贤良，至于文章制作，凡髦士名儒无不仰止，若乃道德仪型，虽野老田夫亦知。”学宫中的教谕、训导等老师则盛赞其曰：“孝廉（举人别称）王中美学宗洙泗，派接濂溪，孝友性成笃人伦，以达天道，坚贞自矢严一介，以挽颓风。一贯独绝支离，闇修不轻著作，接芝颜者半载，如坐光风霁月之中，述懿行者多端悉。据耳闻目见之事，厥功存乎，守侍其人，洵足表章。”

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自己的侄孙王令树已于该年（康熙十七年）考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王中美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华夏中心”的意识，仍然是王中美的心理定势，他认为“食人之禄，死人之事”，这是古人传统的价值取向，大儒郑原繁说过，“臣无贰心，天之制也”，君臣之际以风节立论，王中美对他心中的国家——“前朝”，有着一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眼里的国家就是前朝和旧君。在高压下，莲社的一班旧交均已去世，自己也年老体衰，苏州是去

不成了，他干脆一个人搬到庆云寺下院去，一个人“孤寂”地在那儿“阅经”，表达了不恋富贵，决不仕清的高风亮节。从此，在庆云寺下院里，晨钟暮鼓声中，我们看到一个茕茕独坐的身影，在青灯黄卷间，冷坐蒲团，凝神极虑，思接千古。

休隐去世后，张丕扬又写有《挽休隐僧》，表达了对老友去世“无比悽惻”的伤感：

寂尔阅经西院僧，伤心十载老诗朋，
生推华阅唯清昼，死得真詮是惠能。
锁骨销时怜瘦鹤，茆斋过处忆澄冰，
白头都讲空挥泪，薪尽谁传无尽镫。

“伤心十载老诗朋”，休隐上人是张丕扬相处十年的诗友，休隐上人去世的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张丕扬生于清顺治十年（1653），虽说他“天资警敏，超绝一时”，十多岁就考中秀才，康熙十四年（1675）22岁时就赴江宁乡试，但在王中美眼中毕竟是个“娃娃”，王中美去世时张丕扬也才二十几岁，张丕扬成为秀才后，才可能与休隐上人成为诗友。若不是张丕扬才华出众，且出身于泰兴名门望族张氏三凤堂家族，两家又是亲戚，其弟王尊美的媳妇（王令树母亲）是张丕扬叔祖父、进士出身的张日浣的女儿，他最喜欢的侄孙王令树和张丕扬又为至交。否则王中美是不会放下身段与这个晚辈交往的。去世的休隐上人在张丕扬的眼中，是禅宗六祖惠能一样的高僧大德，但其后继无人，张丕扬只好发出“薪尽谁传无尽镫”的深深叹息。

苏中自卫反击战中的 泰兴攻城战

□ 何锡龄



1946年7月13日,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领导下发起宣泰战役,作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先机制敌,自卫反击的第一仗,已成为“七战七捷”的光辉战例载入史册。

六十八年过去,笔者偶尔接触到两份现存泰兴市档案馆,由时为国民党泰兴县县长薛佩琦,于1946年7月13日和7月17日上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署名“共匪攻陷县城”的档案,虽说相关文章早已对这一战役有过介绍和记述,但细读这份档案,对宣泰战役中的泰兴城攻坚战,仍有值得研究之处。

一、先机制敌,粉碎敌进攻阴谋

这两份档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为推卸城池被攻破,给自己解脱的辩解词。在7月13日的报告中,薛佩琦诬称:“共军破坏停战协定,倾巢向我侵犯。共党时据如皋、黄桥、姜堰、海门间,为新编第11师、第6师、第7纵队等正规野战军21团,及南通、如皋、如西、如东、靖江、泰兴

等地方的独立团共9个团,总计兵力达53个团。”

到底是谁破坏停战协定,历史早有定论。蒋介石在1945年底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后,第二年6月间,他就倚仗美国支持和拥有美械、日械装备的440多万军队,公然下达了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命令。此时,前来侵犯我苏中解放区的是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李墨庵部,计有15个师约12万人。这支部队闯进解放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敌人的暴行,黄桥、古溪、珊瑚、城黄、新街区的20万群众,于6月15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的反革命罪行。为保卫胜利果实,6月27日,我特务团将前来侵犯黄桥的敌八十三师一部击退。七月上旬,集结于南通、泰兴、泰州、靖江一线的敌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九师及地方保安团等10万人(尔后续有增加),拟在七月中旬向我如皋、海安、黄桥、姜堰等地发起全面进攻。这一消息被我从内线获悉后,华中野战



军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遵从中央军委“在内线打几个胜利”的指示,从而奋起反击。所谓“共军破坏停战协定”的指控,实在是敌军倒打一耙的恶人先告状。

薛佩琦呈文中说,参加攻打泰兴城的我军部队有“53个团”,实为夸大其词。当时,我整个华中野战军总共才有15个团二万五千多人,参加宣泰战役仅是陶勇的一师、王必成的六师、管文蔚所率的七纵等部,围攻泰兴城的更非“共匪纠集大股兵力(六个团)”,而是六师的3个团,到15日,六师原打援的一个团入城参战后,方才为4个团。

二、集中优势兵力,围城打援

“本月十三日晚,共匪纠集大股兵力(六个团分头窜抵城郊,八时开始围攻,激战终宵)……”敌在呈文中对当时形势判断的话语,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军围城的情况,但真实情况敌军并不了解。为组织这个战役,我军针对驻守泰兴、宣家堡两地的国民党守军仅有一个团,且两地又相距25里。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故以四个团先行围困泰兴,两个团攻打宣家堡,让其首尾不能兼顾。为阻敌援兵,又以两个团设伏在泰兴城北,打击口岸前来援军;七纵三个团埋伏在宣家堡以北、张甸以南地区,阻击泰州、姜堰增援之敌。敌所谓“本月十三日晚,共匪纠集大股兵力”,实为我围而不攻时的一种战略手段。真正的攻城时间却是在解决宣家堡守敌后的第二天,亦即7月14日夜9时。至于敌守城部队,有多篇文章认为是“敌五十七团”,但薛佩琦的呈文中说得很明白,“本县驻城守军为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团刘光

宇”。我军攻进县城后,“敌五十六团第一营被全歼,营长付玉被击毙,县城突破。团长刘光宇率团直属队,第三营退守庆云寺核心阵地,作困兽斗。两军对峙呈胶着状态,白天国民党军轮番扫射,阻止新四军进攻;夜幕降临,攻守转烈。”敌五十五团团黎殿臣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说:“入夜,共军数次冲击,间隙急促,实际上是一个连绵不断、强弱变化的多次大冲击波……”由此可见,就时间上来讲,攻打泰兴城的这场战斗,如果从14日晚开始,到16日晨四时撤兵,共历时一夜一天计36个多小时。

三、正确的行动来自于正确决策

围攻泰兴城,我军之所以选择“从城西、西南两面攻城”,其原因是形如西瓜状的泰兴城,东面城墙高耸,外有20多米宽的护城河。北面地势险要,通泰桥下河水湍急。而西面与西南处,地势平坦,无大的障碍物,敌无险可守。狭窄的护河城,因多年失修,河道淤塞,竖放着一大船,就可以连接两岸。更为主要的,敌城防工事情况,我军早已掌握。据曾任中共宝应县委副书记的刘冠刚老人回忆,这次战役前,他作为地下党员,以行商身份,将城内敌之兵力及驻防情况一一查清,通过秘密渠道送至部队。这一切,无疑为我军选择正确的突破口提供了先决条件。

“敌一个营被包围在东门大庙内,15日在我政治攻势下投降”。据当年目击者回忆,敌核心工事所在地庆云寺,“大门朝南,我军从西南边进城后,一队队新四军战士如潮水般,抄近旁的西鞠家巷直往那儿奔去”。这种情景,说明我军对地形地物了如指掌,否则是绝不会想到走



这条小道的。在更多老人的记忆中,我军为了近前指挥,六师的临时指挥所就设在鼓楼南街文明桥西侧的一间民房里,这里距西北面的庆云寺仅一箭之遥。庆云寺西侧八一巷(原名红袍街)内一间民房前,斑驳的砖墙上,现今仍留有多处深深的弹孔,可见当时战斗的激烈情况。

四、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之目的

敌军固守的庆云寺,始建于宋咸平二年(999),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刹,内有山门殿、寺庙广场、藏经楼、千佛楼等多幢建筑。敌军将这里设为团部后,外置铁丝网,内有明堡暗垒。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扫清外围,攻进大门,呼啸的弹雨声中,战士们奋勇向前。“刘光宇携小老婆躲在掩蔽部内,以外援无望而神情沮丧,指挥意志颓废,军心动摇,士气浮动。”据现年86岁的金瑾同老人回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中,敌军一席姓的政治部主任曾打出白旗,准备投降。后因敌设在大院前面藏经楼上的10多挺机枪火力太猛,我军进攻受阻。最后,为保护这座千年古寺庙和藏经楼内珍藏的五千多本明版本珍贵经书不受损失,我军主动撤兵。

事后,刘光宇受到蒋介石接见,为夸大战功,他在《和平日报》上发表声明,说“共军是在本军独立奋击下败溃的,整个战斗过程从无任何友军增援。”而明眼人一看就知,一个团的部队被打得仅乘不到一个营,这种自吹自擂,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无庸讳言,在这场攻城战中,我军虽取得全胜,但因撤退匆促,十多名后勤人员在敌人的搜捕中残遭杀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一名年仅13岁的司号员,这名战士是宿在苏利巷中睡过

了头,追赶部队时被敌捉住,凶残的敌军将他的耳朵割去,放在城门上示众,还将他的锁骨用铁丝穿上,与十几名解放军战士一起,被押赴刑场。为了新中国的解放,无数革命先烈所作出的牺牲,我们应铭记在心,永世不忘。

这次攻城战役,我军不光在战略上达到了歼敌有生力量的目的,就缴获来说也蔚为大观。在薛佩琦呈报的这份缩水的“损失”清单中,就计有:法币2657.8万元,5瓦发报机一部,三灯收报机一部,七九捷克式机枪一挺,驳壳式手枪10支,763驳壳枪3支,六五式步枪8支,七九步枪149支,弹药8600余发,木柄手榴弹70个,刺刀30把,军毯29条,军服250套,绑腿250副,军帽150顶,棉军帽50顶,钢盔200顶及子弹盒30只,被俘73人。

五、并非意外的结局

这场以宣泰战役为首的苏中自卫反击战,粉碎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破坏和谈协议,企图消灭我人民武装的阴谋,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年后的1949年8月4日,那个“年少英勇,用兵有方,固守待援有功”,晋升为国民党第100军副军长的刘光宇,出于对和平和光明前途的追求,终于幡然醒悟,在由程潜领衔的湖南起义通电书上签了名。

改革开放后,定居美国的刘光宇,先后两次与时为泰兴市政协委员的女儿李玲见面,对女儿多次转告和提出的“家乡人民捐弃前嫌,邀请他回乡省亲”的要求,激动不已,老泪纵横,但终因年老多病而未能成行,从而成了其一生中的最大遗憾。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 周文汉

自卫战争(即解放战争)期间,在我们华中革命根据地,广泛流传着一支名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的歌。歌中唱道:

毛泽东当家家家旺,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三年反“围剿”,
八年反“清乡”。
你东打西击,神妙莫测,
果断坚决,机动灵活。
你打垮了日本鬼,
消灭了反动派。
你是百战百胜的将军,
毛泽东的好学生,
中国人民大功臣。
跟着你就胜利,
跟着你就胜利。
毛泽东当家家家旺,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三年反“围剿”,
八年反“清乡”。
七战七捷威名扬,
七战七捷威名扬。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南周庄(今属分界镇)建立了国营乡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我十来岁,担任乡儿童团团长。自卫战争期间,我在南周庄小学读书,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

自卫战争时,泰兴县城、黄桥镇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我们乡下还是共产党、民主政权府掌控。苏中军分区文工团经常到我们南周庄及其周围农村演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文工团所到之处,地方上的文娱组织也有节目与其同台演出。我们南周庄小学的《海军舞》是很有特色的,每次演出都少不了它。我当时就是《海军舞》的舞蹈演员之一,有幸与文工团经常接触。文工团的保留节目是大合唱,大合唱的第一支歌就是《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几次一听,我们就会个七不离八,大家再一凑,全会了。我今年八十三岁了,这支歌颂粟司令的歌,还能一字不落、从头唱到尾,全在于我对粟司令的崇敬、爱戴和缅怀。

记得粟裕跟陈毅带着队伍从江南过来,到了黄桥。黄桥人民在黄桥中学大操场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我们小孩子赶去看热闹。主席台前面是军乐队,那个大铜号圈在身上,锅子大的喇叭竖在头上,吹起来像老牛叫。50把小铜号,都有红绿绸子做飘带,风一吹,一起轻轻飘拂起来,好看极了,威武极了。开会时,台上有人讲话,台下鸦雀无声。事后有人告诉我,那位个子不甚高,身体瘦瘦的人就是粟裕。哎哟,他们能带这么多兵,能跟鬼子打,能跟反动派拼,真是了不起!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这支歌,从表面上看,只是歌颂粟裕同志个人的丰功伟绩,用现在的

标准衡量,“只见英雄,不见群众”,有个人崇拜之嫌,近乎“宗教赞美诗”,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它确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人民群众唱起它,欢欣鼓舞;反动派听了它,胆战心惊。就跟扭秧歌一样,哪里的群众扭起秧歌,就表明哪里的群众获得了解放,表明哪里的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这支颂歌也是如此,它是给老百姓吃的一颗定心丸,“跟着你就胜利”,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就胜利。这支颂歌是掷向敌人的一颗重磅炸弹,“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七战七捷威名扬”,是给反动派的一个下马威,你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粟司令打仗仗仗胜》这支歌对我个人而言,也是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不管是白色恐怖还是黑色恐怖,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只要哼上几句,就有了勇气,有了信心,有了力量,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一个花甲过去了,这支歌至今仍记忆犹新,就是因为时时唱,时时想,时时记心上。

(整理/王皓 王亮昭)

注:国营乡是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以抗日英雄、革命先烈徐国营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乡。该乡以南周庄为中心,共6个自然庄,计8个行政村组成,范围相当于原长生乡的三分之一。徐国营烈士的英名载1993年《泰兴县志》。徐国营烈士的战友,福建省建设厅离休干部孙谷星,出资为其勒石树碑。

陈玉生



陈玉生与周茂敬 的生死情

□ 周文汉 孙谷星

我儿时的老家,是分界镇南周村东庄,东邻是陈玉生开的肉店,西邻住的是周茂敬家。1938年7月,国民党何克谦、朱骥部,在黄桥米巷,借口召开团以上会议,将周茂敬杀害,并在黄桥张贴告示,说周茂敬是共党、土匪、不法分子。周茂敬的尸体由黄桥进步人士朱履先,用棺材抬送周家。我看到周茂敬肠子都流出来了。三天后,陈玉生携妻杨桂芳,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吊丧。在周茂敬灵柩前,陈玉生挂出请私塾先生写的挽联,上面写



的是：山河咽，英豪一代长相诀别；长诀别，诸亲齐悼合家丧绝。大约两个小时后，陈才快快离去。陈、周二人的交情何故如此之深呢？说来可谓话长。

陈玉生原是穷苦人家出生，从小也没念过什么书。1930年前后，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并担任过季家市保卫团张锡三的勤务兵副官、收税员，还开过几年的肉店、烧饼店。1936年前往上海谋生，为某工厂烧过包饭。陈玉生为人性格刚强，敢作敢为，爱打抱不平。周茂敬同样性格豪爽，重江湖义气，有一定的心计，在同龄人中较有号召力。1930年左右，周茂敬曾任红十四军游击队长（《泰兴人民革命斗争史》有记载），他骑在马上能左右开弓双手使手枪，很是威风。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段时间去向不明，成为他的一个政治疑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周二人都回到家乡，共同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队伍，没有其它挂靠和组织关系。为解决枪支短缺难题，二人便跑到如皋、南通，投奔何克谦、朱骥部，获得枪支三百多支，使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得到了扩充和提升。后来，二人又密约分开，陈玉生率一部分人，打进国民党李明阳、李长江部，在港西广陵、曲霞一带，组建了一个八支队，由陈玉生任支队长。其时，周茂敬与陈玉生旗鼓相当，

也有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打进了国民党芦家庄何克谦、朱骥部，并任副指挥攻打过季家市的日本鬼子。由于周茂敬的这支队伍刚组建不久，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出动人数，和敌人正面交锋是要吃亏的，所幸的是，当时满田的玉米有一人多高，周以打冷枪的办法，声东击西，以青纱帐为掩护，和敌人捉迷藏。打得鬼子死的死，伤的伤。

1938年8月，何克谦部有一个姓齐的团长，住南周庄时向庄上人说起枪杀周茂敬的原因，说周是共产党，很厉害，他来投奔是有目的的，就是想夺兵权，很危险，于是，只有先下手为强。如果让周茂敬翅膀硬了，再与陈玉生一会合，就不好对付了。随着周茂敬被枪杀，陈、周二人的合作也画上了句号。此情此景，自然会让陈玉生很痛心的。

1939年后，陈玉生正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特别党员，并在以后的郭庄战斗中起义，功不可没。接着又参加了黄桥决战，胜利后被任命为“苏中三分区司令员”，历任过“苏北兵团苏南军区东海舰队参谋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戎马一生，识大体，顾大局，对朋友肝胆相照，对党无限忠诚，其功绩将名垂史册！

（整理/ 严永芝）

口述人：周文汉，八十三岁，退休语文老师。孙谷星，九十一岁，一九八三年离休，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济南、上海等战役，现定居福州，享受厅级待遇。

文字整理：严永芝，七十岁。



□ 孙谷星

短枪队长

黄凌强

黄凌强,泰兴黄桥西黄家溪人,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兄弟数人都有些文化,也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在新四军东进前,就参加了地下党组织。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曾任泰兴地区游击队长、团参谋等职。当时日本鬼子和汪伪政权把苏中三、四分区当作清乡扫荡的实验区,面对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上级决定精兵简政,主力部队下放,干部下基层,如营长下放当连长,连长下放当排长等。黄凌强也由团参谋,下放当短枪队长兼教导员。该队当时共建四个小分队,每队四十多人,短枪队员都是班排以上干部,同时备有日本鬼子的服装以及工人、农民、学生的服装,在黄桥、泰兴、季家市等边沿地区,神出鬼没地活抓日本鬼子,抓汪伪军政人员进行思想改造,让他们变成为我方所用的两面派人物,以便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情报,更好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对敌斗争的形势逐渐好转,我军可以平安通过敌封锁线,可以购买一些药品,有时还能买来一些枪支弹药及其它军用补给品。

泰兴蒋华区是个长江边沿区,与靖江仅相隔一条大河,日伪在江边封锁很严,可谓据点林立,因此,要进出该区域很难很难。泰兴县委四五个月间先后派去区长、区委书记等七人,都不能打开局面。敌人曾公开叫嚣,蒋华区固若金汤,新四军插翅难进。时任泰兴县长的叫杜干全,系蒋华人,他常年有家也不能回。面对如此形势,县委反复研究,决定



派黄凌强去蒋华区,任区长区委书记。于是黄凌强带领一个小队的短枪队员,去蒋华区走马上任。

黄凌强和他的警卫员每人都佩有两支短枪,一支是二十响的快慢机,一支是勃朗宁手枪,都是从敌人手上缴来的。他枪法精准,身手敏捷。上任后的第十三天,黄凌强就带队镇压汉奸二十三人;第十六天,又镇压民愤极大的敌伪人员八人。此后的一个月内,黄凌强的短枪队又在敌人据点内抓获敌营长一人、连长二人、排长二人。针对这些人贪生怕死的特点,黄凌强开展政策攻心,做统战工作,要他们认清形势,给自己留条后路,为家人留条生路。在思想工作取得成功后,再把他们放回去,使这些人成了我方在敌人据点内的地下情报员,敌人的沿江关卡,也成了我军打通江南的地下交通线路。当时,敌人对黄凌强十分害怕,几乎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给他取了个“黄辣椒”的外号,只要一提黄辣椒,泰兴、靖江地带就知道是黄凌强了。后来不光是敌人称他黄辣椒,就连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干部,都亲切地称他这个外号。

黄凌强对敌斗争有勇有谋,多次受到县委和军分区的表扬。有一次,黄凌强和两名短枪队员,护送杜干全县长去军分区开会。当时军分区设在周家庄头,必须越过敌人城黄路、季黄路封锁线。出发前大家进行了乔装打扮,带着伪造的证件,半天功夫,越过敌人五、六个据点,有四、五个岗哨上前盘查,黄凌强胆大心细加神勇,使敌人岗哨还未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命归黄泉。杜干全县长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短枪队工作干得很出色,好似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心脏,你们的辣椒队长,辣得敌人丧胆,辣得老百姓拍手称快,但他对同志们都很甜呀。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事有凑巧,1948年,我调到苏北兵团指挥部的卫生部工作,黄凌强在卫生部任秘书(相当于副部长职,如部长外出,部里工作由他主持)。当时部队进行三查三整运动,为搞好这项工作,部机关民选支部,我被选为部机关支部书记。有些同志提意见说:黄凌强和其警卫员都有两支短枪,不合规定,必须交出一支来。黄凌强一时想不通,对我说:你是支部书记,这种事如何处理。我说你过去是我的领导,现在还是我的领导,三查三整是中央布置的,不搞好不行。当兵的爱枪爱得要命,可以理解。但光棍不吃眼前亏,如等政治部出了通知就被动了。通过交谈,第二天黄凌强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一支枪,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赞赏,促进了三查三整运动的开展。黄凌强就是这么个严格执行政策、不让别人为难的明白人。

当年七月,我调到兵团前梯队参加济南战役,与黄凌强同志匆匆作别,从此便天各一方,没有再会面。依稀记得,黄凌强的爱人是江南苏州人,不仅文化高,人长得漂亮,还会唱京剧,加上黄凌强会拉胡琴,可称妇唱夫随,相得益彰。短枪队长黄凌强,既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几十年不见,惟有一份深深的思念之情。

(整理/ 严永芝 周文汉)



卞保胜的“顺口溜”

□ 周同成

革命战争年代,蒋华区和尚卞保胜抓住替主家做佛事的机会,运用“顺口溜”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下面集录的是他的部分“顺口溜”。

◆ 太阳下山日渐昏,晚霞腾空人起神,不表民国事情多,就说横巷黄辟尘。黄辟尘剥削人,富裕银子无其数,文武通养在家门,丫鬟小姐几十个,童子先生几十双;曲塘街上开布店,通州城里开纱厂,黄桥镇上开当铺,西关桥头开钱庄,猪行酒行他拥有,又开五升大油坊。家有良田八千亩,沙洲地界设庄房,家有敞庭四十零八间,又造几十间大洋房。买了个国会议员职,横行霸道赛阎王,收租抽税真恶毒,欺压一百零八庄。

◆ 黄朴安,鬼名堂,尼姑庙,变学堂,玻璃灯,几十张,先生倒有二十个,学生只有十几双,供吃供喝总不够,成年累月敲竹杠。

◆ 黄懿寿多疯狂,捐局设庙上,买了长枪肩上扛,还有多少机关枪,钱粮弹药多停当,四处收捐赛虎狼,大口小口都要捐银洋。猪子捐,黑心肠,家家户户都遭殃,大男小女吓得慌,穷苦百姓没法想,不知何日见太阳?

◆ 穷人的日子苦难当,只有反抗求解放,其中有个余大化,胆大勇敢算他强,率领民众几百双,风炮、大刀、拐子枪,浩浩荡荡奔横巷。还有一个余学先,奋勇当先来帮忙,团结一百零八庄,钉耙锄头排成行,夫男小女人多少,点烛焚香烧横巷。黄辟尘着了慌,写封书信到大堂,翁县长着了忙,快快打轿去横巷。黄辟尘一见主子到,赶忙出来迎县长,县长请到花堂上,老虎椅子摆八张,金漆圆桌亮堂堂,香茶美酒供桌上,大鱼大肉一齐上,大香大烛供中央,酒肉吃得精大光,看不见老百姓在何方,不若开山打麻将,麻将打到天要亮,县长赢得心里痒,丫鬟小姐来恭喜,百般贺奉想领赏。正当县长开心时,来了狗腿子余圣章,急急忙忙报县长,快快收麻将,四面八方人齐到,火把照天烧县长! 翁县长抬



头看,吓得尿裤裆,六神无主逃命忙。实在无法想,粪桶箱里藏,伙计推出庄,一口气逃到黄桥专局上。瓜皮帽子掼桌子,不得了的了不得,这样的事情无主张,多亏了余圣章,及时报信忙,不然我命送横巷,躺在床上闷思想,我这个县长怎么当?!

◆ 不说狗县长在发慌,再表余文化本领强,派人捉住狗腿子,大骂奴才余圣章,你的罪恶真不小,通风报信不能饶!逃走了狗县长,藤条扁担打在你身上,余圣章还想犟,老百姓不让当,捆捆扎扎吊树上,叫他见阎王。

◆ 余大化一声令下威力强,男女老少干得忙,东边去弄杂货店,西边又弄棉籽行,棉籽扛来几十担,抬来煤油几十箱,高粱稽子扛多少,麦草挑来几百双,棉籽堆在屋中央,柴草靠在高墙上,前门接到后门口,后门连到二门上,前前后后齐点火,把黄家烧个精打光。震东市一把革命火,烧出穷人大胆量,烧得狗地主逃他乡,火光冲天人心快,“八大家”不敢逞凶狂。

◆ 不说黄地主烧个光,再表民国二十六年上,泰兴城有个鬼奸臣,要问他的名和姓,逆子就是变不全的蔡鑫元。他投靠日寇当汉奸,带领鬼子进泰兴,蔡鬼城里蹲,手下委重任,封了奴才袁怀杰,南门城外当团长。这个狗奴才,四处筑碉堡,下乡抓丁又抢粮,青年小伙子,抓去穿上黄军装,背上老鸭枪,各区各乡敲竹杠。我区的八圩港,有个韦夕金,跟他当上鬼连长,成了土匪赛阎王,一抢抢到丰迎乡,乡长名叫周老邦,家里被他抢了精大光。多少粮食和钱钞,左右邻居都知道。基于民兵得了信,马上集合来抵抗,有的伏在沟岸上,有的伏在坟园旁,有的掼榴弹,有的打步枪,弄得韦夕金没法想。乱抓老百姓用绳绑,一齐带到七圩港,寒冬腊月没被盖,一直冻到大天亮。韦夕金,害人精,你没法新四军,专来欺侮老百姓,一定不放你过身。过街的老鼠人人打,韦夕金慌了神,连忙逃命到县城。蔡鑫元急得双脚跳,命令营长戴选裕,蒋华桥筑碉堡,拆毁多少好民房。我八区有个大区长,名字叫做黄凌强,文武双全本领强,指挥打仗本事高,伪军称他是“黄辣椒”(注),敌人再猖狂,黄区长不服降,调来人马和枪炮,半夜三更打碉堡,打了胜仗称“好佬”。打死六圩港恶霸赵丙高,戴选裕头上挨了刀,摸摸头上痛煞人,换上便装逃进城,蔡鑫元吓得掉了魂!

◆ 泰兴的逆子说过去,再表靖江的朱鼎坤,朱逆早就做土匪,害得老百姓不安宁,吃了官司几年整,出牢门转家门,匪性十足不肯收,跑到江南拜先生,拜的是圩塘的张福胜,张贼重用小奴才,委任朱逆大队长,送他武器和子弹,让他出来乱杀人。朱鬼领到



赏,返回到靖江,收买恶棍几十双,个个背上拐子枪,强迫乡保长快送粮,乡保长不敢犟,把粮食摊到百姓头上。朱鼎坤当了鬼队长,勤务兵用上好几双,抢得粮食无其数,自家盖起大瓦房,赌吃嫖遥钱化光,伙同小老五再去抢。作恶多端人心怒,吓得四下无处藏,急忙逃到泰兴城,投靠蔡鬼当汉奸,兄弟俩人当上了营连长。伙同伪军李志海、霍金生,南门外头坑害人。新毗二镇筑碉堡,害得群众不敢跑,杀人放火抢钞票,穷苦百姓真苦恼。

◆ 诸位不要忙,再说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穷人求解放,我县有个大能人,名字叫做陈玉生,三分区上当司令,率领分区主力团,调来靖、泰两县独立团,陈玉生把命令下,一齐攻打泰兴城。陈司令多勇猛,四面包围如铁筒,枪炮榴弹一齐上,毛竹梯子爬城墙。一直爬到城顶上,枪炮炸弹威力强,打得“和平军”(伪军)哭爹又喊娘。新四军打胜仗,开了门进了城,消灭了二鬼子,活捉了蔡鑫元,押到黄桥镇,开会来公审。小老五,朱鼎根,落了魂,怎么弄,拱地洞,夜里逃到孔家桥,被我民兵捉住了,五花大绑押进城。陈司令把话讲:明天八月半,毗卢镇上去会审,老百姓吃小老五的苦,三天三夜说不完,大家把冤伸,杀杀剝下火坑。

◆ 人人歌颂共产党,人民翻身得解放! 个个称赞新四军,真是穷人的大救星,消灭了和平军,赶走了东洋兵,大家才安宁,奉劝同胞快起来,万众一条心,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幸福的日子才来临!

注:“黄辣椒”的来历:黄凌强同志1943年至1944年任我蒋华区(八区)区长,在抗战艰苦时期,他跟敌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税收之争”尤为感人。当时敌人很猖狂,到处设税卡,以苛捐杂税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连我方中心地区也设卡收税,妄图从经济上扼杀我方。黄区长针锋相对,派遣税收所长何仁同志带人到泰兴城猪、油、酒出口必经之地——三角洲收税,敌方立即将我方人员捉进城,撕毁税册,打了人。黄区长即令各乡、镇民兵队长连夜动手,一下子捉走敌方税务人员及相关人员60多人。敌人恼怒,第二天便出动一营人马扑向六十六圩,袭击我区政府。黄区长早有埋伏,激战近一天,打败敌人的进攻。敌人无可奈何,请出张家桥名士张锡五出来调解,答应释放我何仁等三人,同意我方继续在三角洲收税。何仁安全返回,黄区长才将对方人员交张锡五带走。敌方人员说:“八区区长不叫黄区长,叫黄辣椒,真是太辣了。”这样“黄辣椒”的名称就传开了。



张京元与《刪注楚辭》

□ 张 定

张京元,字思德,号无始,张聽曾孙,张然长子,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江西提学副使等职。史载:张京元“幼有异禀,三龄即读书成诵。比长,文辞敏贍,倾倒一时”。张京元的才华得到人们的赞赏,兴化人、状元宰相李春芳爱其才华,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张京元。

在中国文学史上,张京元以小品文和楚辞研究均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泰兴少有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特别是在中国研究楚辞的学派中,张京元以批评王逸和朱熹而成为开宗立派的人物。

张京元著有《刪注楚辭》一书。

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以其奇幻的想象、崇高的理想、激越的感情、鲜明的形象和巧妙的构思一直是我国上古文学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

峰。楚辞的世界既博大精深,又令人神往!但是,楚辞的研究与研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相比较,不知要难多少。所以,国学大师姜亮夫说:“至于屈宋、赋家之学,既无古今、文字、学说是非,地也人也之辩,举不能以治经治史之方术绳之,故人之苟焉而已者,多欲染指尝一脔,而不知其难有倍于六经诸子者。”著名的楚辞研究大师周建忠也说:“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艰奥、词旨的婉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并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就连为张京元《刪注楚辭》作序的焦竑在序中也说:“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闲深,难以遽测。”因此,面对这座隐在云雾中的高峰,好多人望而却步,“有能虚心求之者鲜矣”,不是高手是不敢走进这个“世界”的。



张京元的《删注楚辞》及书前焦竑序文均写于万历戊午,即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谓“删注”,是删去王逸《楚辞章句》中收录的汉代文人的作品及王逸、朱熹两家的注文约十分之七,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批注。张京元在《删注楚辞引首》中说:“屈平、宋玉、景差之徒,皆楚大夫也,故离骚等篇称楚辞焉。”楚辞,既是为中国古代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诗歌别集,也是中国第一部作家个人的专集,系楚人之“辞”,宋玉、景差皆屈原同时的后辈,亦为楚人,故宋玉的《九辨》、《招魂》和景差的《大招》(有学者认为是屈原作)也系楚辞。而“王逸注楚辞十七卷”,将汉人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思》和王逸自己所撰的《九思》,这些都是依仿屈原《离骚》、《九章》之体写作骚辞以哀悯和伤悼屈原的,不是楚人之“辞”的作品也收录进去了。至于朱熹的《楚辞集注》就更荒唐,收有贾谊的《吊屈原文》,文体是“赋”,与楚辞《离骚》不类,甚至还收了贾谊的《鹏鸟赋》,不独文体不类,其内容亦与楚辞和屈原毫无关系,真不知道这位老夫子心放在哪儿了。张京元反对将这些文章“具载集中”,他说:

彼汉人自为汉语,冒楚於汉,其义何居?且骚之为骚也,前此未有也,体繇独创,语出新裁,刘勰所称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良不虚也。汉诸君子沿波袭流,情不肖貌,效顰增丑,代哭不悲,总属葛藤,自当削去,匪云陋汉,亦自张楚云耳。

张京元非常推崇屈原,“读九歌则潇湘如画,诵九辨则魂断秋空,惊采绝艳,信哉罕俦。”他认为王逸、朱熹收录的这些汉代的文章是东

施效顰,“代哭不悲,总属葛藤,自当削去”。故他“闲窗无事”之际,“参合诸家,偶为删正,存者十三,削者十七,臆证者十一,略賤浅语,冥契深情,以意逆志,俾览观者得之言外”,将这些汉(代)人的作品尽行删去。

张京元受明代后期解放思潮的影响,研究楚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做“遵用朱子之书说者”,而是“核者存之,谬者祛之,未备者补之,或辞意未惬,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定正”。他把王逸以来影响很大的“讽谏说”,朱熹以来影响更大的“忠君爱国说”置于一旁,对儒家文艺观进行否定,所以,焦竑称赞他“令读者不主故常,而得作者之本旨,君诚独得其解,而非随人以为妍媸者已”。

张京元说:“《离骚》写怨,已尽淋漓。”^①他认为《九章》是“屈原既放”之后的“愤辞”^②。“原见楚国将亡,痛惜在心”,因而“发愤陈辞”,作为《惜诵》。又说:“怅焉恋国,爰赋《怀沙》。”他注意发掘屈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怨愤,这固然是司马迁以来“主怨派”的老观点,但和其他人不一样,张京元主要是紧扣朱熹的“摅怨愤而失中”的错误论调来强化自己的论点。他说:“朱子刊定《楚辞》,愤惋忠诚,微讥雅变。则是惊鸿游龙,惜其无驯伏之态,而毛嫱西施,恨不为德曜之短衣也。不亦固哉!”“惊鸿游龙”是曹植形容洛神之美的话:“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③《文选》李善注云:“翩翩然若鸿之惊,婉婉然若游龙之升。”在这里,张京元把屈原比作洛神,指出朱熹一方面要求屈辞具有惊鸿游龙之姿,一方面又希望屈辞不失规矩驯伏之态,肯定它的形式之美,排除它的内容之怨,这显然是不对的。所谓“德曜之短衣”,是借汉梁鸿与孟光



的故事来指出朱熹评屈观点的错误的。孟光又名“德曜”，初嫁梁鸿时，衣著华美。鸿不悦。光问其故。鸿告以喜粗布短衣。于是，光如妆见鸿。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④张京元的意思是说，屈辞美如毛嫱、西施，而朱熹讥其“搃怨愤而失中”，“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这无异于要求美女穿上丑服，以丑代美。“不亦固哉”，不近情理。

张京元在《九歌·序》中说：“沅湘之间信鬼，好祀，原见其祝辞鄙俚，为作九歌，亦文人游戏，聊散怀耳。篇中皆求神语，与时事绝不相涉。旧注牵合附会，一归怨愤，何其狭也，今悉为正之。东皇等名，皆楚俗所祀神。”张京元认为《九歌》只是用以散怀的“游戏”之作，并无寄托。因此，“逸（指王逸）注牵合附会，悉归怨怼，几失楚人面目。”

王逸在《九歌》序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认定《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时期所作，因而在《九歌》注解中不但蕴含了屈原的情绪体验，而且也包括了王逸自己的兴寄思想，即通过“讽谏”表达忠君爱国。王逸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中分别得到发挥，如洪兴祖言《云中君》：“此章以云神喻君，言君德与日月同明。故能周览天下，横被六合，而怀王不能如此，故心忧也。”朱熹也指出：“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褻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⑤洪、朱二

屈原天问图



人的观点显然与王逸“忠君说”一脉相承。

近年来，随着许多考古的新发现，学者们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就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九歌》中诸神在郢都大都出现，这就否定了屈原只有流放到沅湘时才能见到这些祀神歌舞的成说。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九歌》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楚怀王执政的三十年之内，出土文献的部分资料起到了有力的辩证和推动作用。王逸、洪兴祖和朱熹认为《九歌》作于屈原晚年流放于沅湘时期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屈原放逐说”逐渐失去说服力，从而证明了张京元注释楚辞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正确性。

至于《天问》，王逸认为是屈原“见楚有先王



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懣,舒泻愁思。”即屈原看到宗庙中的图画有感而发,“因书其壁”。王逸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宗庙是神圣之地,岂是屈原这样一个“放逐”之人能随便题字之处。故张京元认为《天问》是追忆往古,随便提问之词,“无聊杂忆,往古随笔”而已。至于王逸“因书其壁”一说,张京元则明确否定:“旧谓其见宗庙画而问焉,恐壁间未必画此种种也。”

张京元的《删注楚辞》对后世研究楚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其影响最大的首推戴震及其弟子王念孙、段玉裁。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屯溪人。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乾隆二十七年举人,乾隆三十八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乾隆四十年赐同进士出身。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是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我曾经看到一本《张无始先生鸿飞阁删注楚辞》,为戴震藏本,全书书页的天头^⑥、地脚^⑦、字里行间,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注,连许多书口(书叶的正中折缝处)也都写满了,足见戴震对此书研究之深。该书空白页处还写有姚江卢文昭为戴震《屈原赋注》写的序,和戴震自己的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戴震突破儒家传统的楚辞研究,是在继承张京元对儒家文艺观

的否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史载:戴震中年穷困,“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飧,闭户成《屈原赋注》”。《屈原赋注》在张京元删去汉(代)人著作的基础上,又删去了宋玉的《九辨》、《招魂》和景差的《大招》,只注屈原作品二十五篇,目次为《离骚》,《九歌》(凡十有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九章》(凡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轴》、《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夫》。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戴震在哲学上批判朱熹。在楚辞研究中,他继承张京元对儒家文艺观进行否定的思想,认为屈原“愁怨”的目的在于“为”国,这就是“理”,志在楚国,是屈原“忧思不解”的原因,绝不是朱熹所说的“抒怨愤而失中”。他在注《天问》中说:“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舒愤懣也。”处处看到《楚辞》的愤懣。

在戴震《屈原赋注》的影响下,他的学生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等人也在楚辞研究的园地里辛勤耕耘起来。

注:

①《删注楚辞引首》。

②《九章·序》。

③曹植:《洛神赋》。

④《后汉书·梁鸿传》。

⑤朱熹:《楚辞辩证》。

⑥指书页上端即上栏以外的部分的空白处。

⑦指书页下端即下栏以外的部分的空白处。



季三嗒子的故事

□ 周同成

相传，古时候泰兴出了个奇才，名叫季三。他说话嗒里嗒吧、不利索，人都俗称为“季三嗒子”。他人虽是“嗒子”，但才华盖世，高中状元，被皇上招为附马，官至左都御史。

季三嗒子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刚正不阿又能言善辩。他上朝时诙谐幽默，若要弹劾贪官庸吏必歪戴乌纱帽，朝左歪弹劾文官；朝右歪弹劾武官。文武百官一见他歪戴官帽上朝，必心惊肉跳。至今还传有歇后语：“季三嗒子上朝，地动山摇。”

季三贵为皇亲，仍心系乡里，为家乡人做了不少好事。那时，泰兴人的房屋既矮且窄，住着极不方便。季三运用智慧为家乡人民改善居住条件。有次上朝，故意爬着进宫。皇上见了，非常奇怪。便问附马何以如此？季三说：“万岁有所不知，根据法规，泰兴人的住房建得又矮又窄，进出总要双手着地弯腰爬行，我若不这样上朝，恐怕以后回乡时就不能进屋了。”皇上听了，心中不安，又疼爱女婿，即下令准许泰兴人建造七架梁的高大房屋。此后，泰兴人建房多为七架梁结构。此举令朝野敬佩，官民都说：季三“仁”！

那时赋税繁苛，连民间宅前屋后栽的树木都要缴税，树越大税越重，百姓怨声载道。季三

想了办法：待柿子成熟时，精心挑选最好的柿子进贡皇上。皇帝吃了附马敬献的柿子，感觉鲜甜可口，美不可言，即要附马常献。季三说：“万岁爷，这是最后一次了，再也吃不到了。”皇上惊问：“何故？”季三装出一副可怜相答道：“父皇准臣实奏：现在农民真苦，连栽的树也要纳税，缴不起税，都把树砍了，柿子也就没有了。”皇上动了颜，下令：“凡柿树不交税。”季三叩首谢恩。传令时，季三巧妙地说成：“凡是（柿）树不征税。”这样，泰兴人免去一税。这一着，更让上下折服，都说：季三“能”。

时间一长，季三对朝廷腐败很看不惯。就想点子捉弄皇帝老儿。他选用泰兴的土特产——油炸豆腐干子和鲜嫩的菠菜，精心烹制后进贡皇上。皇帝吃惯了山珍海味，农家菜从没沾过牙。品尝后，感到此道菜味美形佳，风味独特。问：“爱卿，这是何菜？如此诱人！”季三跪答道：“吾皇万岁，万万岁！这皮黄肉白者为‘金皮银心果’，那嘴红尾绿者称‘红嘴绿叶艾’，精烩细调成‘红嘴绿尾、金皮银心的鸳鸯会’，吃了不仅龙体安康，还能延年益寿！臣特备此人间仙菜孝敬万岁。”皇上龙颜大悦，命御膳房烹饪仙菜“鸳鸯会”。厨师不知其来历，以为“果”是树上长的、“艾”是地上爬上，始终找不到“金



皮银心果”和“红嘴绿叶艾”，当然做不出佳肴“鸳鸯会”。皇上得不到满足，急得火冒三丈，接连杀了好几个御厨，搅得御膳房一片恐怖，宫廷中也是人心惶惶，文武百官都说：季三“狠”！

此后不久，季三上朝，适逢皇太子在殿前踢毽子。毽子是用国币铜钱和雄鸡尾羽做成的玩具。老百姓的孩子在院舍踢毽子玩耍本不当回事，然而太子在宫殿中乱踢就有伤大雅。群臣见了不悦，议论纷纷。季三虎劲一上来，顾不了许多，就声色俱厉地面奏皇上：“万岁！现有人手持凤毛，脚踢国宝，有伤国体，该当何罪？”皇上还在为“鸳鸯会”生闷气，一听大怒，国宝岂容脚踢？严令斩首！对此，群臣咋舌，满朝震撼！都说：季三“绝”！

任何事情瞒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季三捉弄皇帝的事很快被查明，这还了得！皇上异常恼怒，意欲将季三斩首。幸得公主和皇后苦苦求情，碍于情面，皇帝决定将季三充军到最苦之地，让季三吃一世的苦，受一世的罪。于是随意挑了个错把他发配出京。临行时，季三进宫谢恩。他故作惊慌地说：“臣宁出潼关三千里，不去延令黑松林！”皇帝好奇，便问：“何故？”季三浑身发抖，答道：“此处蚊大如雀，啖人立毙。”皇帝正是要让季三受罪，即说：“那里正是你去的，不必多言。”季三赶忙叩头谢恩。又说：“万岁，俗话说，‘妻到天边夫要行’，对吗？”皇上斥道：“胡说，应是‘夫到天边妻要行’！”季三跪曰：“谢主隆恩！谢主隆恩！”皇上顿时醒悟，说溜了嘴，上了当。因皇帝金口玉言，不好改口，只好让季三带着公主一同回到延令黑松林，而此地正是季三的家乡，季三用他过人的智慧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季三嗒子携妻带儿回归故里，因公主携带的皇家财富无数，置了田地庄园，又经数年的经营，成为泰兴首富，生活当然无比幸福。有一天，季母说：“不知哪辈子积了大德，过着这样的日子，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呀！不过常听儿媳讲京城如何繁华，皇宫如何壮丽，要是能亲眼见一见就死也闭眼了。我已风烛残年，恐怕只等下辈子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季三跟公主商量道：“尽孝乃为人之本，不如仿造金銮宝殿让慈母一饱眼福，才不留遗憾。”公主起初不同意，认为私盖皇宫是谋反大逆，要灭九族的！季三嗒子说：“公主放心，我已再三思量，既敢为，也定有办法料理，决不留后患。”公主相信丈夫的才智和为人，欣然同意，并鼎力帮忙，夫妇二人同心协力，筹足建筑材料，请来能工巧匠。由于季三有恩于乡里，大家都全力相助。不多久，一座金銮宝殿便完工落成。季母的愿望得以实现，更是乐不可支！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季三嗒子造金銮殿的事被人告到皇宫，皇上本就万分怨恨季三嗒子，这一来更是火上浇油，立即派人下来查访，如是实情，就地问斩，诛灭九族。所好的是季三为官时恩泽官民，有好心人早告之季三。季三虽有谋算，但面临弥天大祸，不免有些紧张！

这一天凌晨，大雾锁天，对面不见人影。有个拾狗屎的背着屎篮子来到新建的金銮殿旁观看，守殿的人嫌他脏不让靠近，拾屎的硬要入殿观赏，双方争吵拉扯时惊动了季三嗒子。季三刚走近殿前，拾屎人调头就走，撂下来一句话：“庙宇造者虽好，缺少四大金刚。”季三嗒子一听，心领神会。立即着手将宝殿改成寺院。佛像、香案、钟鼓等等全部到位，并亲自命名为“庆



云禅寺”，制成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殿内请僧人住持。然宝殿是新建的，又怕引起怀疑，县令就公告县人广献蜘蛛，将众多蜘蛛放到殿内，满殿结上蛛网；再四处撒上灰尘，墙壁上铲除部分油漆，形成旧的模样。京城派下来查访的人还未到县城，这里已一切安排停当。

很快，皇上派来的人到了，直奔目的地察查。只见殿内塑满佛像，僧众坐坛诵经念咒，经声佛号，晨钟暮鼓，香火兴旺，哪里是什么皇宫？分明是座大寺院。建寺庙，办佛事是公认的善举，朝廷也是认可的。查访者回京如实具报，皇上听后，不但不责怪季三，而且说季附马做了好事，加以褒奖。

季三嗒子好容易躲过一劫，但受惊不小。为避免再生事端，就真剃度出家，到庆云寺做僧人了。



泰兴馆藏书画赏析

□ 沈佳惠

◇ 清·王维翰《双羊图》

从古到今，以动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数不胜数，涉及动物种类繁多，唐代韩幹《照夜白图》中膘肥体壮的白马，后蜀黄筌《写生珍禽图》中形象逼真的鸟虫，北宋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中富丽妖娆的锦鸡，明代唐寅《枯槎鸬鹚图》中乌黑发亮的八哥，清代沈铨《松鹤图》中引颈高唳的仙鹤，现代齐白石《游虾图》中晶莹剔透的竹节虾，现代徐悲鸿《奔马图》中奔腾的骏马等。在泰兴博物馆馆藏作品中，也有一幅以动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其鲜活逼真、生动可爱，耐人寻味，它就是清王维翰的《双羊图》。

《双羊图》纵 173 厘米，横 44 厘米，水墨，纸本。据有关资料记载，原有四幅，因时事变迁，有三幅已散佚，尚存一幅。画作正中两只羊首



尾相看,一只稍黑,一只呈白;一只羊角坚挺向上,一只羊角弯曲向后。两只羊均体格健壮,毛质浓密,略显丰满的身躯,显示着生活的富足安逸。羊本是温驯善良之物,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参天大树为它们遮风避雨,鲜美的嫩草,让它们撒欢,供它们尽情享受。忘情惬意之时回首顾盼,“咩咩”欢叫。画家有意在羊角上处理不一,似乎在传递某个信息,一直一弯,一刚一柔,一公一母,四目相对,含情脉脉,情景交融,和谐共处。也许这才是画家所要表达的情愫。此画足矣,无须多言,题穷款“墨林”一处,钤白印“维翰之印”一枚。

画作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工致的勾勒和细腻的描绘,只有水墨,以草书入画,用简练的笔法描绘景物,浓淡相宜,形象逼真。这种画是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水墨画,所谓意,即画者心中感受到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造型观和境界观。

王维翰是一位全才画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称他:“工山水、花鸟,以大幅擅长。光绪四年(1878)尝作《一路荣华图》。”《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载:“王维翰,字墨林。工画法,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妙,初宗十三峰草堂。”“十三峰草堂”指乾隆、嘉庆年间的画家张赐宁,凡山水、人物、花鸟、墨竹,无所不工。王维翰初学画时,从研习张赐宁的画法开始,悉心观摩,潜心研究。《县志》又载“值粤乱四方书画知名士避居邑中,维翰相与研究技益,进尤擅大幅,一枝一叶具有海阔天空之势,为邑中李颀后一人。”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有一批书画家来到兴化避乱,王维翰曾向多位画家请教,技艺大增,尤其擅长大尺幅画作,竟有“海阔天空之势”。正是因为王维翰不故步自封,吸取众长,不断研究,锐意进取,才终获成功,赢得了画坛地位。李颀,是扬州八怪中富有独创才能的画家,画坛地位显而易见。王维翰虽未名列扬州八怪,但他的画坛地位已与李颀相当。可见,王维翰的画在兴化百姓心目中已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县志》还记载了他的一段故事,“北普济堂几倾圮,维翰以画资充兴筑费,遂克复前规云。”在需要伸出援助之手时,王维翰挺身而出,毫不犹



豫地拿出自己卖画所得,修缮北普济堂,此善举深得人心,后人将这件事载入了史册。王维翰成名后,收徒授画,弟子李凌沧、黄元章等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家。

另外,王维翰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科第三甲第189名进士”(大部分辞书载王维翰中的是光绪二年的进士,误)。考中进士,是古代科考中极其荣光的事。清代共开进士科114科,考取进士2.6万多名,平均每年只有百余名幸运儿产生,所以属于稀缺的人才。进士的光环为王维翰的画作加分不少,近年来市场价格只增不减。《中国画家大辞典》记载“王维翰……为曾文正所激赏”。曾文正即曾国藩,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王维翰受其赏识,无形间又为他的画作增值不少。至于王维翰有没有做官,或官居何职,目前尚未找到确切资料,只知王维翰卒年八十四岁。

◇ 汪麟祥墨菊画

传说一天清晨,天刚微亮,如皋的一户人家就忙得不亦乐乎,轿夫们整装出发,目的地是邻县的古溪。日头刚到晌午,传来轿夫的号子声。焦急的主人喜笑颜开,不等轿子落地,便迫不及待地打起帘子,迎接这位远道请来的尊贵客人——汪家大门堂二公子。这位汪公子是个“自来熟”,毫不拘谨,在众人簇拥下进屋。屋里早已摆下了宴席,八仙桌上各式菜肴果品糕点应有尽有。主人请汪公子上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汪公子问话了:“今天有什么事吗?”主人答道:“明日家慈六十大寿。”汪公子听后心领神会,随主人来到书房,书桌上文房四宝早已齐备。约摸半个时辰,房门打开,主人迫不及待地进屋,看后,啧啧称赞。在一片感激声中,汪公子带着主人馈赠的礼品,坐着轿子打道回府。

这位汪公子究竟是何人?汪公子本名汪麟祥(1808-1863),字仲山,泰兴古溪人,出生书香门第,是位禀生,又是远近闻名的画家。古时,秀才分为三等,成绩最好的称为“禀生”,由国家按月发给粮食,有如现在享受的政府津贴,那份荣耀令多少人羡慕不已。偏偏他又不爱顶戴花翎,将受聘的官职让给了古溪镇上的顾姓绅士,终身不仕。正因如此,使得这位出身好、有地位的汪公子相当接地气,谈笑幽默,待人随和,广受赞誉。谁家有事,都以请到他写诗作画为荣。除了本县人家请,就连周边的海安、如皋、南通等地也有人慕名前来,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这就有了本文开头那户人家,因祝寿而请他的一幕。那书房内必是祝贺用的对联、中堂、横披等了。这也正是通泰地区汪麟祥存世作品较多的主要原因。不但博物馆有收藏,就连民间也屡见佳作。

那汪麟祥的书画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呢?《光绪泰兴县志》记载,他“诗才隽妙,工书,尤精绘事,每作必题其颠,走笔立成,时称三绝”。怎一个“颠”字了得!既写出了他思如泉涌,创作大胆,文才绝妙,技艺精湛,又从侧面反映他不拘小节,落拓不羁的个人形象。据



说,汪麟祥弃官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浪迹天涯,云游名山大川,访朋交友,修炼书画,造就了他成名成家。

汪麟祥的存世作品形式多样,有书法横披、对联、花卉立轴、四条屏等。其画内容涉及梅、兰、竹、菊等,尤以淡墨菊最为出名。这幅墨菊立轴横24厘米,纵92厘米,保存完好。画中菊花取局部之景,花茎由右向左喷涌而出,像美丽的凤尾,又像一道静止、无声、散着浓香的瀑布,无拘无束,自由倾泻。修长的枝条,纷乱地穿插,稀疏地缀着几朵花。菊花各具情趣,姿态不一,完全不同于盆栽之菊的肥硕体态,让人感受到秋天的萧瑟清凉。题诗:“竹篱笆外夕阳情,花越萧疏气越清。是我是花浑不辨,一秋相对寂无声。”款识“仲山”,钤“麟祥”、“汪麟祥印”两朱白方印。潇洒的行书,夹杂着草书的气息,有如行云流水般,气韵贯通,气势灵动。诗、书、画达到了完美融合,难怪后人称其为“三绝”。

汪麟祥的墨菊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这样的艺术形式称为写意画。写意画是较工笔画而言的,用笔简练,挥洒自如,注重神态的表现和抒发作者的情趣。汪麟祥自己曾说:“板桥石不点苔,仲山菊不勾叶”,这是他的独特之处。诗中一句“是我是花浑不辨”,直接将自我的情感倾注画中,表现出秋风萧萧的意境。更是画者心如止水、超凡脱俗、向往恬适隐居生活的内心独白。尽管后来经历战乱,家道中落,汪麟祥曾以坐馆教书为生,但他安于寒素清贫,依然谈笑往来,和蔼如佛。据其后人讲,《汪氏族谱》记载,汪麟祥的墨菊画曾在法国巴黎展览获奖。至于此话的真伪,已无法考证。如若是真,说明汪麟祥的画名已远播海外,有了国际知名度;但若是假,也可说明其画名在世人心目的地位,人们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





《泰兴猫画》收藏记

□ 汪念先

据老人们讲,泰兴的画家特别喜欢画猫,画好之后还要拿到县衙去盖上知县的大印,这样挂在墙上才有避鼠效果。这些画一般不是出于名家之手,人们也都不当回事,大约和我们现在的年历、年画一样随意挂在墙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画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收藏者心目中,收藏一幅泰兴本地画家所画,并盖有知县大印的猫画,却是多年来的心愿。

那天晚上,笔者陪丈夫出去散步,在小区外的地摊上看到一幅猫画,画高120厘米,宽64.5厘米,画中四只花猫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在画的正上方,盖着2寸见方、朱红灿然的泰兴县知县大印,落款为“光绪乙巳年秋八月上浣,东阳清甫恽邦彦写于桐荫轩之南窗下”,下有二印,分别为“恽邦彦印”和“清甫印”。我们看到此画时,摊主正和围观者争论画中的“东阳”是否浙江省东阳县,在众多疑惑的目光和摊主“还是你们识货”的奉承声中,我们购下了此画。

人们常说收藏的乐趣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购得此画后,丈夫和几个挚友一道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画是老东西,泰兴知县的印也是真的,落款时间“光绪乙巳年秋八月上浣”,说明画作于1905年8月上旬,作者为恽邦彦。问题的关键是要证明恽邦彦为泰兴人,且在泰兴作的此画。

查阅泰兴县志,泰兴姓恽的人不少,都是从常州迁徙过来的,恽氏一族善画,族人中有清初

著名画家恽南田。恽邦彦是他们的后裔吗?

据《光绪泰兴县志》“区域志·沿革”篇引用《后汉书郡国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江南通志》等史书记载,泰兴为“故东阳地”。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此类记载。据《江山小阁诗文集》记载:清末,时任泰兴学宫教官的华亭人徐凤鸣先生为他所赏识的学生金弼考中秀才,入邑庠读书,写了一首诗,题目为《东阳金生衡浥得馆选喜而有作》,因金弼“原籍皖省”,为他未呈准入泰兴籍,许多考生反对他在泰兴参考,是徐凤鸣力排众议才得以应试,故徐凤鸣写诗庆贺时,特别强调其为“东阳人”,即泰兴人。

另外,和延令、济川一样,东阳在泰兴常作为地名使用,解放前夕,泰兴城东门外五里墩、张家坟、杨园、朱家庄一带,地名为“东阳镇”。

至于“桐荫轩”,在泰兴老干部局东侧,原有一张姓人家的私家花园,园内遍植梧桐和竹子,主人将花园取名为“桐竹园”,取古代神话传说中“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的含义,希冀张氏子孙仰凤凰之高风,慕劲竹之亮节。园内书房即名桐荫轩。

综上所述,画此画的恽邦彦无疑当为泰兴人,作画的地点也在泰兴城内。

夕阳西下,庭院深深,浸透历史沧桑的古画穿越时空来到我们身边,品咂着那尘封岁月的往事,很容易让人从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我们又为留住泰兴历史文化做了一件好事的感觉。



黄桥民间武术 的源流与发展

□ 韩风月



一、黄桥民间武术——起源和发展

黄桥民间武术的历史悠久,它的源流及发展与黄桥的发展同步,是文化名镇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黄桥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由驻军传入民间。二是黄桥宋代商贸繁荣,庙宇林立,带动了来自民间的拳师艺人、保镖武师,富户护院、山门武僧武道等来黄桥从业,从而使武术传入民间。

最早从外地传入黄桥的武术,一说是岳家拳、岳家枪,传入时间在宋朝,二说是福建少林派武术。传入时间在晚唐。武术传承的方法不外口授身教,较少详尽文字记载,这里只是根据一鳞半爪的资料作出的推断。

黄桥民间武术的发展,大致源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历代的驻军。黄桥堪称兵家必争之地,至今黄桥的周边仍保留了以军营为名的村,如浩家堡、阎家堡、张家营、李家营等。习武是

军队的必备技能,黄桥历代驻军,多为从中原调入,他们在驻防黄桥的同时,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武术,如“阵操”、“对练”、“实用进攻与防御”、“十八般兵器的使用”等,这些武术部分散落民间,与黄桥地方的武术相融合。二是历代王朝为巩固封建统治在民间设立的团练。团练有一定的组织架构,掌教团练的多是军队中的骨干或南来北往的武学精深者,教授实用的进攻与防御等武术,以及各种冷兵器的使用,团练的存在势必影响和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三是古代实行武举制。特别是明清时期,崇尚武术之风较盛,追求功名者通过习武晋仕,促进了民间武术发展。四是名目繁多的庙会为切磋交流武术提供了平台。黄桥历史上文化活动频繁,庙会搭台,以武会友,物资交流的同时进行武术交流,是庙会的主要活动内容。五是农民起义推动了武术发展。历史上黄桥地区多次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如清道光年间“扒抢丁大椿”、



民国初年“火烧震东市”等,每次农民起义都有武术高手的影子,举义前他们以习武交友,探究武艺的方式聚在一起。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武术往往会获得较快的发展。六是镖师、护院拳师及江湖艺人的活动,丰富了武术内容。黄桥地区物产丰饶,商贸繁荣,经济发达,四乡八村不乏豪绅富户,这些大富人家为保平安,往往延请拳师艺人,看庄护院。护院者之技各有其绝,亦有人为大户课徒教子,使技艺得以传袭。此外,黄桥是苏中水陆交通枢纽,江湖艺人择地坐馆授徒,极大地促进了黄桥民间武术的发展。

二、黄桥民间武术——近代记事

1929年,在国民党政府左翼人士冯玉祥、李景林、张文江等的倡导下,掀起了“国人强身卫国”热潮,把武术统一称为“国术”。以闻学桢等人为代表的黄桥武术界闻风而动,筹备成立了黄桥国术馆。经武术各门派多次协调商定了武术馆章程,确定了统一的武术服饰,并在黄桥福慧寺切磋武艺,以武术比赛优胜者丁德元、闻学桢为国术馆首领。1929年8月上旬,丁德元乘坐国会议员黄璧成的铁驳船去上海购置武术器械,行至十九号桥,被地方武装拦劫,不幸被乱枪击毙。失去了领头人,黄桥诸武术同仁十分沮丧,筹办中的武馆就此胎死腹中。

同年11月,由官方主办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举行,黄桥武术选手闻学桢和来自全国十五省(市)及中央国术馆的选手共一百余人参加了比赛,6万多观众观摹了盛会。历经分组初、复、决赛等十八轮对抗淘汰赛,终于决出了包括最优等者10名,优等者10名,中等者10名在内的前30名。闻学桢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了

优等19名的殊荣,获大会奖励宝剑1把。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虽然经历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但从总体上看黄桥的群众性民间武术活动还是向前发展的。这一时期,黄桥的武术爱好者们以健身强体为目的,以师带徒,口传身教,开展了一些刀枪拳剑杂耍活动,范围相对狭小。文化大革命中,武术被视为传播封建迷信的工具,遭到了禁锢。可笑的是,那一年曾有外来民间武术艺人来黄演出,竟被视为“五湖四海”恐怖分子受到迫害。1972年后,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黄桥习武之风渐起,门户见重,民间武术团队相继建立,习武健身之风遍及全镇。

1973年,由黄桥武术爱好者组成的武术队,代表泰兴市参加了江苏省武术表演比赛。孙兰英、程士超担任队长,李明福、程美福、刘筱朋等十二人为队员。武术队在南京的比赛获得专家和同仁的一致好评。其中刀进枪、徒手双人对、双刀双勾被主办单位选中参加了晚上的公演,他们的精采表演赢得全场掌声雷动。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观看表演,他在接见队员时高度赞赏黄桥武术队的技艺。比赛归来,黄桥武术队在泰兴体育广场连续几天向群众汇报表演,受到了观众高度赞赏。

黄桥电机厂、省黄桥肉联厂先后建立厂武术班,主要习练少林拳、太极拳、健身气功等,参加人数两厂共计达到八百多人。厂武术班习练活动,丰富了工人文体生活和增强了工人体质,提高了生产效益。得到了县体委、县总工会、县团委、机械局肯定,并作为经验向全县推广。

黄桥中心小学常年开展剑术、莲湘、腰鼓等体育活动项目,被泰州体育局命名为传统体育



学校。

2005年,黄桥横巷职中组建龙狮武术队,拥有四龙四狮,在江苏省全民健身工程启动仪式、中国·黄桥烧饼节、泰州市三民调演、泰兴市第四届全民运动会等重大庆典活动中一展风采。

2011年,黄桥组织了武术健身交流活动,邀请如、泰、靖的武术好手、健身操队与黄桥的武术队、健身秧歌队、剑操队、太极拳队等同台交流,扩大影响,获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

三、黄桥民间武术——流派及代表

何五太爷为代表的富家子弟,以健身防卫为习武目的。何五太爷去外省跟武林高手习武数年,学成回归黄桥。主要武术流派为武当轻功、鹤鹑撕斗、鸡精腿。传说他能起跳数丈之高,身轻如羽,飞墙走壁。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黄桥广为流传。

丁德元为首,以保家护院为目的、平时教习中下层子弟。主要武术流派为大工合拳脚并用的北派少林拳为主,兼习杨氏太极拳。

刘筠子,原北方人士,以保家护院为业,被黄桥南北典当聘为职业保镖,平时培养一些本地中层人士。主要弟子有陈伯善,陈士超、中西旅馆小老板等。主要武术流派为(回族)查拳为主,查拳有1-10路,潭脚10路、查拳元精、罗家枪、赵家棍及刀、枪、剑、棍、板凳花、武松拳、刀软硬器械等。

余复兴、余隆兴代表的家族性习武。余家祖辈打铁为生,清末民初,专事打造军用兵械兼做农具家用器等。主要练习北派少林拳、武南阳刀、36武松拳、齐眉棍、72朵板凳花,多在中下阶层传播拳术。余家后辈以余正鹏、余正芳、余

正亮为传承人。

陈老天、张仿阳为代表,以习武会友为主。主要练习南派少林拳,以中小架子为主,拳种为猴拳、双圆凳子、判官笔、双剑、双拐等。

余大化为代表的江湖武林好汉,专事劫富济贫。余大化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火烧震东市”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传说他武功精湛,一步跨三丈,飞檐走壁,如履平地。

闻学桢为代表的从事护院保镖。民国初年,闻学桢在黄桥丁韦堂家做帐房先生和兼职护院保镖,闲时教些本地子弟。主要研习站桩、打灯(跌倒)、走步、走梅花桩、抛石锁、举石担、练习刀枪剑棍等。

丁沛生幼年跟叔叔学习少林拳。1930年经地方政府推荐去中央国术馆学习,拜知名武术大师杨澄浦为师,学习太极拳。因在校成绩优异,荣获太极表演银牌,回乡后在黄桥私立中学任教体育。

李明福,中华武术会员、泰州市海灯武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童年嗜武技,10岁时跟大哥李春年学武,后随大哥跟当地名师丁沛生习武,又拜同镇何肖元、陆俊生为师学艺,打沙袋、打干层线、走梅花桩、跳坑、马步、虚步、踢腿、打飞镖、石锁、石担等基本功夯实后,系统地学习了武松脱铐一百零八手、龙泉剑一百零八手、峨眉刺一百零八手、双剑、单剑、双刀、单刀、枪、棍、飞镖、飞刀等武术,后得闻学桢指点,武技达到较高的水平。他还打破武林中门户之见,先后师从南京杨小辫子的传人吕庆生系统地学习少林拳、擒拿格斗、刀枪剑戟等。1973年,师从广州军区杂技团老师孙兰英学习九节鞭、双刀、双勾、刀进枪、飞刀等。



1975年,又去上海拜七星螳螂高手“王老虎钳子”学习擒拿格斗。李明福热心公益,多次组织本地武术竞技赛事和武术健身活动,弟子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培养了一批武术的好手,为普通高校输送了体育人才。1998年,泰兴电视台新视野栏目,以《大侠李》为题,报道了李明福的事迹。2010年,泰兴电视台拍摄《古镇武魂》上下两集播映。2011年,李明福参加江苏省武术比赛,获得了双刀、长穗剑二项金牌。同年,参加泰州地区武术比赛,又获八卦掌、双刀、剑三个金牌。

四、黄桥民间武术——绝技二三事

何五(生卒年代不详),据考约为清光绪年间出生,黄桥何氏十四代族人,家庭殷实。年轻时赴山东拜武术高人为师习武,数年后习成轻功、鸡心腿、鹌鹑斗打等一身好武艺。回到黄桥后,常有武林高手登门切磋武艺,何五艺高一筹,名声远扬。据说,有的镖局运载物品过险界时借用他的名刺,遇有拦路抢劫,镖局亮出名刺,便可放行。一天,又有武林高手慕名而来,在何五走上独木桥时,挑担拦路桥中,试探何五武功,何五轻轻一弹,飞身而过,令高手佩服。

闻学桢(1882-1975),黄桥东北申家庄人,终身未娶。早年随父兄劫富济贫。有一次,富户早有防备,当父兄入院时,护院家丁及官府衙役一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包围。闻学桢心生一计,从灶堂中用箩筐把柴火灰从高处撒扬下去,当对方躲避时,纵身跳进老龙河中,岸上乱枪四射,因久久不见踪影,以为中弹身亡。据说,他从米厂后一口气潜水至三里桥,隐姓埋名逃过一劫。还有人说,闻学桢攀蹬轻功了得,黄桥有

许多圈门,他玩推牌九晚了,怕惊动打更的人,就用攀蹬轻功穿越几道圈门。

余大化原名叫徐天花,黄桥东南徐家庄人。一身好武功,一步跨三丈,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专门劫富济贫。至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天晚上,余大化和三个朋友在一起扒纸牌,轮到他做旬家,他说出去解个手马上回来。就是这一会儿功夫,余大化已到如皋“吃”了一个恶霸地主。第二天早上,这个恶霸地主告到县衙,说昨天晚上抢他家的人他认识,是徐家庄的强盗徐天花。衙役当即来提徐天花去对簿公堂,公堂上,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他叫余大化,而且昨天晚上在一起扒纸牌,哪儿也没去。人证确凿,县老爷给恶霸地主定了个诬告罪,重责五十大板赶出县衙。

黄桥余家武术祖传绝技——板凳花。板凳可就地取材,习武人可当防身器材,亦可当沙包练臂力兼练腿功,第一拳打在条凳左方,通过脚勾带凳,瞬间第二拳打在条凳右方,反复来回,速度极快。条凳练武,无严格的套路,要求步伐稳健,手随心转,法从手出,灵活多变,进退自如。直臂立举、条凳倒立、飞凳杂耍、双手转身劈凳等是一种表演难度高的武术,惊险壮观,深为习武者喜爱,乃武苑中的一枝奇葩。

黄桥曾是中华武术流播之处、光大之地,其民间武术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黄桥人民践行“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的武术主旨,发扬武术传统,光大武术文化,写下了流光溢彩的一页。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广大人民对练武强身健体的追求,素有习艺尚武传统的黄桥,期待着民间武术流传普及的高潮,也必将会迎来武林争荣武苑争艳的春天。



泰兴首刹 建安寺 考

□ 丁 敏



建安寺是泰兴有文字记载的年代最久的古刹,建于梁天监四年,即公元505年,比建于唐永徽五年(654)的道教延佑观早了一百五十年,比建于唐光化二年(899)的律宗寺院广福寺和建于宋咸平二年(999)的禅宗寺院庆云寺则分别早了四、五百年。

同时,当年的建安寺也是泰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寺内仅供僧侣用水的水井就有十八口之多,“古柏千有余株,殿宇廊庑可棲千僧”,故吴江人大学士金之俊在康熙初年就认为其“向称泰邑之首刹也”。

但在泰兴众多的历史记载上,关于这座古寺究竟在何处,却是众说纷纭,连县志上也没有个统一的说法,如:

《康熙二十七年泰兴县志》卷四“禅林”和《康熙五十五年泰兴县志》卷二“古迹”的记载相同:建安寺,在城西郭家庄,梁天监四年建。

《嘉庆泰兴县志》卷六“古迹”载:水月寺,旧名建安寺,在郭家庄,为城西巨刹,梁天监四年建,明万历间邑人戴思敏倡修。

《光绪泰兴县志》卷九“名迹”载:水月寺在县西郭家庄,旧名建安寺,梁天监四年建。

而目前存世最早的《万历泰兴县志》却说:建安寺在王家港,梁天监四年建。

《泰兴县志补》卷二“寺观”载:水月寺在县城西郭家庄,旧名圆通庵,神宗万历间县人戴思敏建,后其子妇李氏同邑人增修,易名水月庵,邑人季天心等再修,又易名建安寺。清康熙中仍易今名。

《泰兴县志校》卷二下则云:水月寺在县西郭家庄,旧名建安寺,梁天监四年建,按此沿袭嘉庆志之误,而以万历志王家港之建安寺,当今之郭家庄水月寺也。寺今存大学士吴县金之俊碑,称泰兴戴思敏孝廉于明万历丁酉捨地建僧



庐，颜曰《圆通》，后其子妇广道人同丛姓增修之，乃易其名曰水月庵，继寺僧复募邑中季天心秀才及众共置田地，又易为建安寺，是寺实先名水月，而后改建安，其寺址在郭家庄，其建筑之年为万历丁酉，与万历志所载梁天监四年建之王家港，断然非一也，之俊碑立于康熙元年。

在这里，金鉞说得很明白，“郭家庄的建安寺与万历志所载梁天监四年建于王家港的建安寺”，“断然非一也”。

根据《泰兴县志校》提供的线索，笔者找到了两份有关建安寺的碑记，两块碑记的撰稿人均为金之俊。金之俊(? -1670)，字岂凡，苏州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降清，历任吏部侍郎、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官至太傅，秘书院大学士。康熙元年致仕，歿于康熙九年。

两块碑记，一为《建安禅寺碑记》，刻于康熙元年，另一为《重修建安禅寺碑记》，当刻于康熙九年前(金之俊歿于康熙九年)。

现将二碑文摘录于下：

建安禅寺碑记

中和殿大学士古吴金之俊

粤稽吾佛，圣人之教，广大精微。虽进修有恒沙法门，而其要，莫先于传道，传道在于明心，明心则人人皆佛。初不专务于像设殿堂，世之愚迷无所趋向，故有覩绀宇金容而后观感兴起，繇外修内，以复其自性之妙者，斯殿堂像设，亦恒沙法门进修之一端，断断乎其不可少也。泰兴思敏孝廉戴君于前朝万历丁酉间捨地三十亩，创建僧庐，颜曰圆通，盖取与人为善之意，鼎

革后，孝廉逝，其子载甫又逝，呜呼，乾坤板荡，人世变更，陵谷易处，所在佛寺鞠为荒原茂草，亡虑百千万亿，求其巍巍鼎峙于劫火洞然中者几希矣，尚安问其明心得道哉。虽然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为之，乃其媳广道人开特达之怀，兴决烈之志，同众姓增修殿堂，门庑益新之，极于完好，犹虑明心传道之难，其人乃敦请金山箬庵和尚说法兹。于是四方禅学，担簦负笈，相与摩肩接踵而至，丛林规制遂大备焉，乃易其名曰水月庵。道人之意，盖不欲以有为而废无为，胶外相而失内治，必交修而备举之，甚合乎吾佛圣人□教之本意。自是则有千仞、别峰二禅师相继住持，至现在辛苦禅师演扬正法，毳袖来归，已见众水趋壑，白云高卧，不羨群飞刺天，而道人复施庄居六间，始成中田之庐，辛苦禅师复募邑中天心季茂才及众善信等，共置斋僧田地计六十亩，又易为建安禅寺，因寓书求记於余，忆自思敏戴君之始构始筑，幸道人缙绪以至於今，历年六十有八，住持凡五易，□□之难继也。愿书之石，俾视以勿忘，且永保勿隳。夫人以田宅遗子孙，未有能十世相守者，道人以田宅归于寺，与三三相终，始非有大过人之识度者，与抑私于己者，人勿与公于□□□人保之理固然矣。矧道人愿力宏深，天龙神鬼当必默护，因果罪福，彰明较著者，其谁得而弁髦哉。余深嘉夫道人之志，因于是乎记之。

(中略)山主孝廉公戴思敏，同室费氏，子邑庠生人极，媳李氏□□□□。山主邑庠生季□□(碑文看不清，应为天心)，同室□氏重建，山主邑庠生□□□重修(中略)康熙元年岁次壬寅桂月(下略)



重修建安禅寺碑记

古吴金之俊

粤稽吾佛，圣人之教，广大精微，虽进修有恒沙法门，而其要，莫先于传道，传道在于明心，明心则人人皆佛，初不专务于像设殿堂，世之愚迷无所趋向，故有覩紺宇金容而后观感兴起，由外修内，以复其自性之妙者，斯殿像设，亦恒沙法门进修一端也，即泰邑建安禅寺，建自梁朝，去邑西数十里，邻大江之侧，甘泉十有八口，古栢千有余株，殿宇廊庑可棲千僧，向称泰邑之首刹也。于南宋时，洪波犯激，洗基为患，内迁十余里，地曰黄家港，历自大明成化间，不期江流相继，而促再迁近郭五里地曰郭家庄。始有金山箬庵和尚开法于兹，四方禅学，挑簪负笈，接踵而至，丛林規制，聊以备观。次有千仞、别峰二禅师相继，未久复有三峰藏和尚冢孙醒热宗工于此，栽松筑堤，恢复梁规，中兴临济，雄崎江夏，毳衲瞻依，座拥万指，因是资费不继，乃募邑中善信，遂置僧田叁百亩，寓书求记于余，自忆寺建梁宋，以及大明，基址三迁，住持几易，惧后之难继也，不由铭碣，恐疑始创，是以略叙历朝颠末，以垂千秋矣。

认真研读这两块碑记，建安寺的沧桑历史基本上可以厘清：建安寺建于梁天监四年，地址“去邑西数十里，邻大江之侧”，在离延令村西数十里的大江边上，规模很大，“甘泉十有八口，古栢千有余株，殿宇廊庑可棲千僧，向称泰邑之首刹也”。南宋年间由于坍江，故内迁十余里至王家港。据《康熙二十七年泰兴县志》卷一记载，王家港在城西南三十里，北有南小港、卢家坝

港，再北十里为洋 涇港，王家港与长江南岸武进县的孟渎河相对，“商舟贾舶所必由往”，是泰兴及里下河地区与江南的主要贸易通道，因此，“江盗出没”，故“曾请永生洲总司镇守”。《康熙五十五年泰兴县志》卷四有泰兴知县陈继畴《防守王家港议》：“泰兴三面滨江，孤城兀峙长江天堑，独当首冲，实陵京瓜仪之门户，海陵维扬之藩篱也，且内无卫所之援，而外有萑符之警，至于王家港在县南二十里，斜连孟渎河，江面辽阔四十余里。”王家港还有学田六百五十亩，“四隅立石为记”。后来再因塌江，总司衙门坍没，学田也“为江潮齿没”，“俱坍入于江”。建安寺复于明成化年间迁“近郭五里地曰郭家庄”。几经搬迁，建安寺元气大丧，趋于没落，不复有往日景象。

明万历二十五年，泰兴籍举人戴思敏“捨地三十亩，创建僧庐，颜曰‘圆通’，盖取与人为善之意”。戴思敏为泰兴名气颇大的举人，当年泰兴名知县舒曰敬任职泰兴时，最为欣赏泰兴五位学子，即朱一冯、张京元、何南京、戴思敏、季三卿，后来，朱、张、何三人不负师望，相继考中进士，思敏亦中举人，独三卿“不售”，不过，后来季三卿子寓庸，孙开生、振宜相继中进士。清初，思敏及其子戴载甫（字或号人极）相继逝世，圆通庵遂“为荒原茂草”。戴思敏的媳妇李氏名“道人”者，“同众姓增修殿堂，门庑益新之，极于完好”，“易其名曰水月庵”。其后，住持“辛苦禅师复募邑中天心季茂才及众善信等，共置斋僧田地计六十亩，又易为建安禅寺”。

在此期间，在寺中任住持者，均为高僧，第一位到此开法的是金山箬庵和尚，金山箬庵和尚即清初镇江金山寺住持箬庵和尚，磬山圆修



之弟子通问。箬庵通问(1604-1655),明末清初禅僧,俗姓俞,号箬庵,江苏吴江人。十六岁时,一日偶过山寺,阅《楞严经》,若有所悟。遂往磐山谒天隐圆修禅师,然久而未契。24岁,投奔南涧理安寺落发为僧,又师事金粟寺密云圆悟,仍不契。旋归磐山寺,一日闻大风进屋而有所省悟,蒙圆修师印可,为临济宗传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初十,圣祖第三次南巡,于四月十八日登临金山。主僧超乐于十九日面奏获准将箬庵和尚语录刻版刊印。由此可见,箬庵和尚是临济宗的高僧,而水月庵由于他的到来而日趋兴盛,“于是四方禅学,担簦负笈,相与摩肩接踵而至,丛林规制遂大备焉”。

其后任主持的还有千仞禅师,名行岗,箬庵和尚之高徒。后为安徽省枞阳县浮山寺住持,华严寺方丈;别峰禅师,千仞禅师门人,后任金山寺住持。都是清初的高僧大德。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金之俊在康熙元年至康熙九年的短短九年时间内,为什么要两次撰写建安寺碑记呢?仔细研究前后两篇碑记,不难发现,第二篇碑记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庆云醒热粹和尚。醒热粹和尚出身名门,是三峰宗创始人汉月法藏的徒孙,他的师父则是有“佛、法、僧”三宝之称的苏州灵岩继起弘储。顺治十五年(1658),醒热粹来到庆云寺任住持,随后他兼任(据佛教协会金剑锋介绍,一个寺庙的住持可以兼任其他寺庙的住持,甚至可以到外地兼任)或转任建安寺住持,醒热粹在建安寺“栽松筑堤,恢复梁规,中兴临济,雄崎江夏,毳衲瞻依,座拥万指”,并“置僧田叁百亩”。在寺中,醒热粹肯定看到了金之俊的碑记(此碑民国初年尚存),对碑记仅重点记述了戴思敏创建圆

通庵,及其媳李道人同众姓增修殿堂之事,而对“寺建梁宋,以及大明,基址三迁”的史实没有交待,容易让后人引起误解,以为建安寺“始创”于此,故“寓书求记于余(金之俊)”,写信求新碑记于金之俊,金之俊收信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由铭碣,恐疑始创”,这位大学士于是又写了《重修建安禅寺碑记》,记中“是以略叙历朝巋末,以垂千秋矣”。

至此,建安寺三迁基址,由长江边至王家港,再至郭家庄的历史史实,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论证金弑“断然非一也”的结论了。

明成化年间迁郭家庄的建安寺与戴思敏的“圆通庵”、其媳李氏的“水月庵”、直至辛苦禅师的“建安寺”压根儿就风马牛不相及,由江边三迁而来郭家庄的一代古刹,明中叶就已消失于古延大地上了,消失的年代至迟在明嘉靖年间。此事虽无确切记载,现存的碑记也多用曲笔,但从大量史料的分析,以及对同为泰兴名刹的庆云寺的研究中,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

明代中期的几个皇帝都崇奉道教,而嘉靖皇帝更是一位排佛的主子,其即位之初,就下令拆除京城内外所有的佛寺、尼庵。“君令大似神令”,故嘉靖一朝,佛教“宗风衰息”。湛然圆澄在其《慨古录》中就说:“自嘉靖(1566)迄今(1607)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鎡莫辨。”汉月法藏也在其《弘戒法仪》中感叹:“自戒坛一闭,仪法尽亡,相顾讥诃,难于和合。”

泰兴也不例外,明代大名士、《万历泰兴县志》的修纂者王稚登的名作《延令纂》中,就谈到泰兴庆云寺僧人生活上的窘境,“无米不能成



饭,无饭不可斋僧”,无米下锅,“炊云岂可为粮”,到了晚上,钵中无饭,一钵清水映月,月庵上人无奈发出“煮月那堪作饭”的感叹。只好四处化缘,“乞君余黍余粟,充我一粥一餐”,没有施舍时,以青菰米、紫芋羹充饥。即便如此,仍“人人枵腹”,最后,衣食无着的“僧徒遂散去”。

据志书、家谱记载,此时庆云寺僧去庙空,“地已奉利卖入民家”,中间一块卖给太学生张臬,寺右边的“隙地”卖给了张鱼、张鲸(张臬第三、四子)兄弟。不过,“修德积善而礼敬神祇”的张氏父子买下该地后,本想“作室于寺后”,但“夜见其地火光熠熠,如百千灯”,疑有神灵护佑,意识到“寺之不当终废,久默有主之者”,“遂不敢取”,庆云寺原址才得以保全。

而古刹建安寺在这场浩劫中却未能幸免,终于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后人见到的建安寺则是由戴思敏“捨地三十亩,创建”的“圆通庵”、其媳李氏的“水月庵”、直至辛苦禅师的“建安寺”,一一演变而来,与明成化年间迁来的古刹没有任何关系了。

康熙四十四年以后(时间待考),醒热粹同门师兄弟卑牧式谦的徒弟、三峰宗第四代传人

中的两大高僧之一的纪荫“驻锡”(驻锡:指僧侣长期驻留一地)新建之建安寺,任住持。据《嘉庆泰兴县志》载:“国朝康熙间,公请震泽神骏寺僧纪荫住持。先是纪荫驻锡神骏,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召赴行在,屡荷宠锡。来泰时恭移御书‘水月禅心’匾额供奉大殿,因名水月寺。并恭移御书‘远清’二字匾额及对联,供奉后殿。暨御书诗章对联、御临米芾桃花行一幅供奉御书厅,又御赐盘龙织锦木鱼垫、盘龙御笔一枝敬谨供奉。”正因为纪荫将康熙御赐的“水月禅心”匾额“恭移”建安寺悬挂,建安寺遂改名为水月寺,此寺名一直延用至清末寺废为止。

光绪三十一年,水月寺走完了官方认可的历程,遭封废。据金鉞撰的《泰兴县志续》卷七记载:“龙璋(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泰兴知县),字研仙,攸县举人,初视事,举行保甲法,以四乡丛祠庵庙,藏匿宵小,严檄封禁百余所。”水月寺是其中之一。

此后的水月寺逐渐荒废,抗战期间还住过日本人和汪伪军,最终变成废墟。后人也只能从志书和传说中去一睹其往日的首刹风采了。





王令树

与“映日堂”

□ 王 健

泰兴的王姓按聚居地划分有上百支,但按照支派区分主要有两大派:琅琊王氏和三槐王氏。泰兴大多数王氏的门联都是:“两晋家声,三槐世泽”,即是指这两大王氏。同时,琅琊王氏与三槐王氏在泰兴又分为若干支,其堂号分别有:映日堂、大国堂、银杏堂、乐学堂等等。

那么号称古泰兴的“王、季、张、何”四大家族中的这支王姓,究竟是泰兴众多王氏中的哪一支呢?

根据对众多史料记载的研究,泰兴家谱文化收藏名人张定先生得出结论,映日堂王姓是泰兴四大家族中的一支望族。映日堂系三槐堂的分支,清朝康熙年间才改为现堂号。

关于映日堂的堂号来源,有个一波三折而又正气贯日的故事。据映日堂第十九世孙王金泉、王茂荣等人讲述:

清朝时,王姓家族出了个显贵,被皇帝敕封为御史。这位御史在朝中为人友善,但有一次却因为仗义直言,替一个同僚辩冤而得罪了另外几个大臣。那几个大臣觉得颜面扫地,怀恨在心,暗地里贬损这位御史,将“三槐堂”的“槐”字拿掉“木”旁,骂他“三鬼堂”。这个御史知道后,觉得自己一生清廉,行事坦荡,无愧于心,现在朝臣们竟然这样挖苦他,而且还辱没了他的祖宗,非常气愤。

有一天,他正愁眉不展,恰巧被皇帝看到了。皇帝问他:“爱卿,你为何事烦忧?说来给朕听听,朕好替爱卿分忧解难!”这位御史不便隐瞒,便将前因后果告知皇上。皇帝说:“爱卿,这事关乎祖宗家族名声,让朕思考一下,赐一个堂号给你,看谁还敢再议!”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早朝,皇帝说:“王御史,尔乃名门之后,朕想了好久都没想到一个可以与‘三槐’相媲美的堂号,爱卿你想到了吗?”皇帝要赐堂号给王御史的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不过一直也没动静,大家都觉得这也许只是皇帝的一句客套话,想不到今日大殿之上皇帝重提此事,令众朝臣大吃一惊。

王御史一直苦思冥想,硬是想不出满意的堂号,此时天子一问,他抬头刚想回答,但见一道朝阳之光照在皇帝身上,王御史顿生灵感,上前启奏道:“吾皇万岁,堂号臣刚刚想到。臣方见一道阳光照耀陛下,臣恳请陛下赐‘映日堂’堂号于臣。”皇帝略思片刻,欣然准奏。于是“三槐堂”改名为“映日堂”。

这个故事的真伪,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据泰兴二招原所长王春生介绍,他曾花费数十年时间寻找映日堂,在原过船镇大杨庄一带访问过不少老人,都说知道有个“三鬼堂”,由此可知,“三鬼堂”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



流传甚广。

后来,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很多典籍记载,终于理清了映日堂的来源。故事中的御史也确有其人,这位御史名令树,字树人,别字桐孙,是映日堂第十世孙。

王令树 15 周岁考取秀才, 21 周岁考中举人, 22 周岁联捷考中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历任四川叙州府富顺知县、礼部主客司主事、精膳司员外郎、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擢升兼山西道监察御史,为清朝泰兴籍三大御史之一、康熙中后期扬州诗坛领袖。

当年,王令树在朝为官时确实因替一位同僚鸣冤辩白而声震朝野。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丙戌会试,王令树奉命监卷。监试官都是由皇帝钦点派任的在朝廷有名望的值得信任的官员,《清史稿志·八十三》言明:“会试监试以御史。”当时列满汉御史各一员,满御史是色克图,汉御史即王令树。

这一年会试发生了一件中国古代考场上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会试即将开考,时为殿试授卷官的张大有上书康熙皇帝,力陈考场中的弊端,预言此次会试定有舞弊现象发生。张大有此言一出,导致朝野议论纷纷,大家都将目光盯在了这次会试上。试后,果有流言传出,“有人状告外帘的满御史监试官色克图违规进入内帘”。

何谓内帘、外帘? 古代科举考试中,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帘官之“帘”,正取于门之帘。贡院内有至公堂,堂后有门通入,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官员,在堂内保管、批阅试卷,并居住其间。考试前三日,这些官员由至公堂后

小门进入,监临随即封此门,并以帘相隔,此帘成为一种界线。帘内的考官称为内帘官;帘外的考官,包括监临、外提调、外监试、外收掌、弥封、受卷、誊卷、对读等官员,称为外帘官。外帘官负责监督考场、考卷弥封、誊录、对读、保管、封送内帘诸事。门闭帘隔,内帘、外帘被分别限制了活动空间,各司其职,帘内帘外不得随意往来,内外公事要隔着门槛交洽,至放榜时方准开帘。

《清史稿志·八十三》亦言明:“试官入闱封钥,内外门隔以帘。在外提调、监试等曰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曰内帘官。亦有内监试,司纠察,不与衡文事。”

而当时王、色二御史俱为外帘官,是不得进入内帘的。

色克图被弹劾,王令树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也没有涉及到他。但他却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上疏康熙皇帝,写明了原委,替色克图辩冤。他在奏折中说:“色克图逡巡不入内帘。”也就是说色克图只是在门口徘徊,因为有所顾虑,最终并没有进入内帘。

两方证词不一。于是,康熙皇帝下旨让负责会试的礼部查清楚此事。但是,礼部负责的人却含糊糊地上了一道折子,回皇上说:“此事恐怕存在。”而这个时候,王令树也上疏了一道奏折,直陈了事情的始末,再次证明色克图并没有进入内帘。

这次会试闹得惊天动地,众多人受到牵连,色克图也因礼部的含糊奏辞被罚奉一个月,但后来还是查清了整个会试的始末,加之康熙皇帝看到了王令树的第二道奏疏,被王令树的执着和诚朴而感动,也不忍再去惩罚色克图 and 那



些办事含糊的礼部官员。于是,就下旨让吏部不要再去查究色克图和礼部的过错。圣旨一下,朝廷上下莫不仰慕王令树,史载:“朝野服,共识朴。”

康熙四十八年(1709)秋,王令树抱病在身,更加思念家乡亲人,遂请归故里,侍奉老母。王氏宗族皆称其孝行,邻里称服其端方,此所谓忠孝两全。

正史的记载与王金泉等人的故事虽有出入,但基本事实与人物活动还是有迹可循的,这支王氏正是因御史王令树而显著于泰兴城,究其缘何改堂号为“映日堂”,也真的与康熙皇帝有关。

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年,时年王令树45周岁,康熙48周岁。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传集部曹于太和殿,特赐王令树御书“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十字。

这是唐朝诗仙李白《谢公亭》诗中的一句,全诗为: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谢公亭位居安徽宣城北,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这里送别诗人范云。谢朓与“大谢”谢灵运同族,世称“小谢”,南朝齐杰出的山水诗人。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意指谢朓、范云当年离别的地方如今还在,诗人每次目睹这里的景物都不免生愁。康熙皇帝虽然没有写这句,但从中还是看出了他的心境。当时,众大臣聚会于太和殿后又散去,康熙皇帝不免为既是自己臣子又是自己友人的大臣们散去、盛会难

再而深感惋惜,这表现了康熙对于王令树等大臣友情的珍视。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不再用孤月、空山之类的景物来写“生愁”,而是描绘谢公亭春秋两季佳节良宵的景物。池花映着春日,自开自落,窗外修竹在静谧的秋夜中窸窣地发出清响,风景虽然好,但人事依然不免寂寞。这两句看上去似乎只是描写诗人眼前的风光,而由于上联已经交代了“客散”、“山空”,因此,这种秀丽的景色,也表现了诗人言外的寂寞,以及他面对谢公亭风光追思遐想,欲与古人神游的情态。康熙皇帝将这种对前贤追思不及的寂寞写给了王令树,其实谁都能读懂其中的原因,王令树少年进士,一生才华,满腔抱负,可偏偏二十年候职在家,得不到国家的重用。康熙为白白浪费了王令树这样的“贤臣”而追思不及。

此御书被王令树奉为家珍,晚年归乡后,将它供奉在其家庙(现观音禅寺)。王令树曾有诗描写御书:

尺幅森如锦,纤毫挽若钩。

方员圭璧合,温润瑾瑜陈。

点画工营势,纵横妙入神。

时光流逝,康熙的亲笔御书虽已不见踪影,但我们仍可从王令树的诗歌中窥见其神韵。

王令树一生工诗,生前他曾整理自己的几百首诗汇编成册,也许是遥念京师的康熙皇帝,抑或是矜饰其在朝中得到的圣宠,他将诗集定名为《映日堂诗》刊行,现原刊本保存在南京图书馆。

康熙五十五年(1716),王令树参与主修泰兴县志,在序中落款其书屋为“映日堂”,家族堂号也随之改为“映日堂”。



花园巷的变迁

□ 郭镇远 葛正浩

花园巷是泰兴城内的一条寻常巷陌，其巷名见著于县志的时间很晚，在一百二十余年前的《光绪泰兴县志》上才看到它的芳名。但它又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巷，据《泰兴地名录》载，“花园巷历史上曾名桑园巷”，并它的历史溯源到明朝初年。明正德年间，时任知县、举人出生的直隶长垣人王遵古在此西侧修筑自家宅院，并“引河水入自家花园点缀”，于是，该一河串两塘的葫芦状小河就取名为花园河，东侧的小巷也就顺理成章的名为花园巷了。

花园巷范围的变迁

花园巷虽小，但它的界址、区域和实际位置却是泰兴诸多小巷中最为扑朔迷离的，与其关系最大的是三井北巷。三井北巷在康熙二十七年的《泰兴县志》中就有记载，遗憾的是没有界址的介绍。

现存花园巷位置的确切记载，最早的是一

份“泰兴县政府”编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的《泰兴县城地图》。此时的三井南巷、三井北巷已不复存在，改名为“三井头”，变为一条横跨今鼓楼西路的小巷。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三井头北界前熊家巷口，而花园巷南北走向，南界前熊家巷，北界土山巷，全长约160米。另外，据老住户回忆，在为民巷（原都天巷，亦称都天庙巷，因巷内有都天庙得名）和老槐树南侧，正对一褚姓大户人家门口处，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小巷，也是花园巷的一部分。这段历史，皆由当时居住于此的老住户口述，因查不到民国年间的确切文字记录，只好存疑待考。

解放初期，政府整顿街巷秩序，订立门牌号码，基本上维持了解放前的状况。

到了文革时期，对街巷名称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自鼓楼西街至土山巷，即原三井头北侧一段和原花园巷，包括那条东西巷的七户人家，一道改为燎原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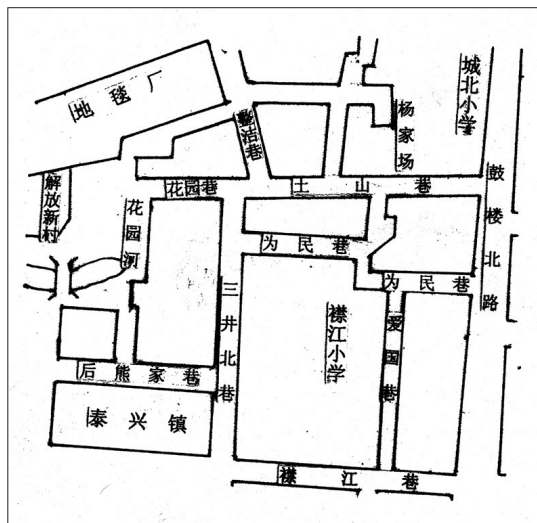
文革以后，巷名大部分恢复旧日名称，鼓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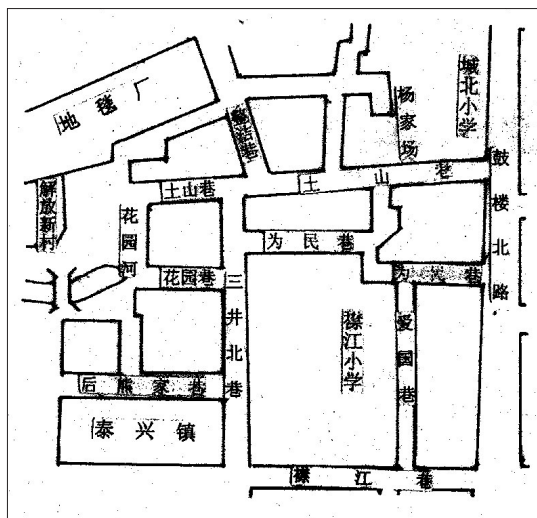
西街南侧星火巷改为三井南巷,北侧燎原巷顺理成章地改为三井北巷,而那条七户人家的东西小巷则命名为花园巷。

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来源于一份派出所的档案,该档案系1967年“破四旧”运动中,街巷改名后形成的户籍档案。文本抬头是燎原巷,其右下侧有一括号,括号内写着“花园巷”三个字,这就意味着,解放后,原三井头北段(西大街至前熊家巷段)人民政府有可能把它和北侧花园巷并在一起,全部叫花园巷。

在燎原巷改名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导致了三井北巷北侧出现了一巷二名的新格局。事情的缘由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泰兴县城人口剧增,一个公安派出所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了,遂分成南北二所,三井北巷的北侧正好是南北二所辖区的交界处,于是,归南所的巷子东侧的门牌号码,根据同属南所的三井北巷南段顺序编号订牌,其对面的西侧住户,从花园巷向南的归南所管辖的住户,全部为三井北巷,从花园巷向北归北所管辖的西侧住户,则订花园巷的门牌号码。如:花园巷南侧陆氏兄弟,有四个门,朝北的两个大门分别为花园巷3号、5号,东山墙上的大门为三井北巷,西山墙上的大门为花园河;又如:花园巷北侧东头第一家孙家,门牌号码为6号(此时已卖给李林生),孙家是一个大家族,房屋有几进,后来分门立户,各家在东山墙上又开了几个门,遂为花园巷8号、10号、12号。这样,一巷两名,门对门,但门牌不同的局面就形成了,成为泰兴巷名中的奇葩。



误标位置的地图



正确位置的地图

地图引起的误解

花园巷界址的是是非非,还与九三版的《泰兴县志》有关,该志收有《泰兴镇图》,是引自1983年版《江苏省泰兴县地名录》一书中,由泰兴县地名办公室绘制的《泰兴镇地名图》,该图



上花园巷的位置误标在土山巷西段,我们走访过拆迁前居住在这儿的多个老住户,得到一致确认。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去调查核实了户籍档案,结果是一样的。众多老住户希望新版《泰兴县志》对此有所更正。

花园巷的地标

在泰兴,花园巷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标,在孙家的东山墙外,长有一棵据说是明代的老槐树,故许多泰兴的老人家,提到花园巷时总不称花园巷,而称“槐树脚下”,如“槐树脚褚家”、“槐树脚李家”、“槐树脚孙家”。

看到过这棵老槐树的人,无人不感到一种摄人心魄的沧桑感,古槐高不过2米有余,西侧树皮和中间的树心俱已朽去,全树只剩下向一侧的树皮,成为小朋友捉迷藏时藏身的绝好之处。树皮上斑痕累累,树梢上有几许小枝,年年逢春发芽爆青,顽强地显露出一丝生机。解放前,不少泰兴百姓视老槐树为“神槐”,在树上挂满红绸,甚至备香烛供品,在树前顶礼膜拜,为亲人祈福还愿。

这棵老槐树在九三版《泰兴县志》也有记载,县志上说,“泰兴镇三井北巷曾有一棵700多年生的古槐树,惜于1987年死亡”。这是关于槐树树龄最长的说法,九三版《泰兴县志》发行于1993年,开始编写却始于1986年,按此推算,该树当种植于元初,泰兴有关元代的记载基本上是个空白,笔者无法得知其详,当然,可以通过测试树的年轮等科学手段测定,不过这只是推想而已。

第二种说法,据老人们口传相授,明朝初

年,一户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定居于此,为表示不忘故土,遂植下此株古槐以示纪念。

第三种说法是最靠谱的,据《泰兴文史资料》介绍:“旧志记载,此树是明万历年间所栽。”至于何志所载,《泰兴文史资料》没有明说,但既然有了明确的书面记载,且来自于志书,当以此为准。

解放后,泰兴镇文物管理部门曾给该古槐挂了文物保护的牌子。1987年,紧邻古槐树的垃圾箱发生火灾,殃及古槐。笔者曾赴现场实地观察过,仅树皮南侧有烟熏火烤的痕迹,烧黑的部分高不足半米,宽不超过二指,以后再路过此处时,古槐终于渡过了它的沧桑岁月,彻底地消失了,仅给我们留下了一点记忆,成了一段饭前茶后的谈资。

新千年来临之际,城市大规模改造,花园巷经过统一规划,旧房拆除后,建起幢幢高楼,现已成为花园河居民小区的一部分。





杨文蔚抗命保档案

□ 汪盛华

1985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得到一个消息:省公安厅将到泰兴县公安局调走民国档案。当即,我赶到公安局说明了民国档案的重要性,建议留在泰兴。公安局领导赞同我的意见,同意拨给县档案局入库。我立即组织全局人员肩挑、手提,当天就将7780多卷档案抢运进馆。为什么要抢运,因为这些是泰兴不可再造、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它真实地记录了在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泰兴党、政、军、工、农、商、学、社会、人文等诸方面的历史,对编史修志、了解泰兴、研究泰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民国政府编印的一部《哀思录》,记载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的情景,激励国人要遵照先生的遗嘱努力建设好中国。县党部主办的四册《大公报》合订本,详实地反映了泰兴的那段历史。伪县长陈汉南(浙江宁波人,大学毕业)的施政演说,有水平,很精辟。他当时就提出了机关实施公务员制,极具研究价值。又如在军事方面,档案中也有客观详实的记录。苏中七战,首战宣堡,战事从什么时间发生,打了多长时间,损兵多少,丢失的六零炮、八二炮、山炮、野炮一一在录,连武器的编码都有记载。

民国档案进馆后,所有的案卷在我手上都过了几遍,整理、查阅时,真是一种享受,归档者、保管者,如此高的水平,如此的敬业精神,十分令人敬佩。正因为如此,也越发使人产生探究其中秘密的念头。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带不走这些档案,但毁掉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能完好的保存下来?肯定和保管人

有关。他是谁?出于什么目的?无人知晓。事情到了1988年,一位朱姓的古稀之人来访,为台湾的刘光余先生来泰探亲咨询相关规定,我接待了他。这位朱老,原是国民党《大公报》的主编,县党部的要员,一百军驻泰刘光余部高参团的要员,又是刘光余、李明珊的证婚人。交谈中,他讲述了杨文蔚冒死保存下全部国民党档案的壮举,解了我心头的谜团。只是他十分伤感地告诉我杨文蔚两年前已去世了。

杨文蔚,新市人。他原是共产党员,县政府的文职人员,后因副县长钱宝康叛变投敌,将其“裹挟”进城,在国民党县党部任文书,保管档案资料。1949年初,国民党从泰兴城撤退,党部交给杨文蔚两桶汽油,命令杨到时将档案全部烧掉。杨没有执行命令,混乱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将档案全部放至县党部的天花板上。事后,他没有随大部队撤离,只身一人逃至上海亲戚家。国民党县党部知道后,派人追杀杨文蔚,密令:一经发现就地处决。解放后,杨文蔚返乡被抓,坐牢20余年。为何坐牢,我们不得而知,单就他冒死抗命保存下全部民国档案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

为了对杨文蔚家人有点说法,在1988年全县“农转非”时,经请示同意,由新市户粮办了解情况,填好申请表,拟将杨文蔚的两个儿子转为定量户口,以便安排一个工作,解决生计,可杨文蔚的夫人没有同意,实属一大憾事。

如今民国档案得到了妥善的保存,历史会记住杨文蔚先生的。



农民暴动的历史画面

——浅析民间话本《扒抢记》的艺术特色

□ 延南林

在泰兴民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期,除有以言情、叙事为主的《玉如意》、《荒年歌》两部唱本存世外,还有一部反映农民暴动的唱本《扒抢记》流传至今。

这部名为《扒抢记》的唱本,根据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泰兴发生的一桩重大事件编写。这一年,泰兴秋涝接春旱,农民颗粒无收,地主借机放债敛财,走投无路的农民铤而走险,以古溪尹正纯、王舜年等为首的贫苦农民从农历三月十二到三月二十,在东到分界,西到周桥,南至广陵,北达蒋垛方圆五十里范围内,组织暴动,前后三次“扒抢”黄桥首富丁大椿。《扒抢记》生动描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历史画面,成为泰兴民间文学的一朵奇葩。

这部说唱,民间曾有多种抄本,笔者见到的是现存于泰兴档案馆内的一部油印件。分上下两篇,全文2.5万字,无作者姓名。文中除少部

六、四字段外,大部为七字段唱词,由此推估,该唱本应为众多说书艺人在日常说唱过程中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

《扒抢记》既能说又能唱,通篇由通俗易懂的口语组成,且大都合辙押韵。这种表现形式受古代五、七言诗平仄音韵影响,在高唱低吟时,既有鲜明的节奏感,又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这应是唱本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由于说唱者(亦即创作者)为本土人氏,乡情民俗烂熟在心,身边事和日常生活的场景又极为熟悉,故让人读来倍感亲切,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上篇中在描述事件发生地黄桥的街景街貌时,唱道:“北关桥对南坝桥,东西大街胜十分,还有出名西大街,一字招牌做营生;布巷专门买布的,鱼巷家家把鱼称;米巷摆的米摊子,猪巷南北做买卖。”短短八句就将黄桥的繁华作了高度的概括。接着讲述了丁大椿置人们



“喝水吞糠度日生,活活饿死无人问”的惨状于不顾,不肯放赈救灾,甚至连众乡绅和知县出面商议借粮也予以拒绝,仍然“二分三分不肯借,照月还要四五分,到期十月算一转,再作本钱把利生”盘剥百姓。以至贫苦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不得不卖儿卖女来还债。通过这种活生生的细节描述,使听众对丁大椿的为富不仁产生强烈不满和无比愤慨,为下篇农民暴动的动因作了有力的衬托和铺垫。

唱本对农民暴动不惜浓墨重彩,作了形象化的描绘。“雁岭有个尹正纯,鸣锣召集众人马,乡下穷人没兵器,钉耙锄子带身旁,鸟枪带来十几支,镰刀数数上百张,芭蕉扇子为旗号,扇子一举动刀枪”。通过妇女打头阵,衣裳兜,淘箩装的叙述,先是“不用梯子就上屋,脚儿一踏到屋梁,笆斗扛来袋子装,百十担粮顷刻光”,继而“扒抢仓房几十个,小麦黄豆满船装,抢去豆饼几万片,香油菜油几百缸”,最后“钗环首饰无其数,四季多少好衣裳,楠木香机抢了去,八仙桌子又十张,门帘床帏和蚊帐,橱柜衣架和皮箱,睡椅圈椅全打掉,字画轴对无半张”。在看似恣意狂奔、热情赞颂式的讲述中,作者又用“人们断顿两三月,这里粮食起了蛀”这两句看似意外又合乎情理的画龙点睛之笔,进一步对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从而对扒抢行动的正义性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和赞赏。这种张弛结合、恰到好处的表现手法,达到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的艺术高度。除此之外,面对同一事件的三次扒抢场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叙述,不光要倒了听众胃口,也会给行文带来沉闷感,让人提不起兴趣。聪明的作者在描述第三次扒抢时,先

用“早晨扒到午后时,午时扒来到晚上,扒去一包又一包,扒去一栈又一栈”作概述,接着便用特写镜头聚焦,“团团围住栈房屋,挤得人身没空当,胖子挤得来喘气,瘦子挤得来断肠,女人夹在男人旁,头发蓬松挂肩上,也有鞋子挤掉了,光脚站在粮堆上,也有上衣被挤开,两个奶子荡又荡,也有小衣挤坏了,露肚白肉粉花香”。这种看似油滑和调侃的语调,不但使行文起伏跌宕,也能让听众在紧张的气氛中得以喘息,有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期盼。

综观全文,作为以农民暴动为主线的故事,《扒抢记》的积极性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也不用讳言,由于作者囿于“我劝世人休刻薄,阴功积德子孙昌”这一传统的道德说教思想,因此带来主题的浅显和人物的苍白无力,也就成了令人最为遗憾的一面,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原先期待的历史价值。唱本虽然对反面典型丁大椿的欺儿霸女、卖官鬻爵、金钱铺路、镇压迫害灾民作了一些揭露和批判;对举义暴动的灾民首领作了叙述和描绘,但总的感觉是就事说事,淹没了人物,最终是见事不见人。再者,由于篇幅失当,上篇讲的是丁大椿女儿红杏出墙,下篇又有一半篇幅讲灾民领袖王舜年之子王锦章如何考取功名,进行报仇的经过,这不光大大冲淡了原本应极力宣传的扒抢暴动,也让人有头重尾轻、不知所云的感觉,远远背离了作者原先的意图和设想。这一切,是由于作者历史认识局限、思想境界不高、文化修养不足所造成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泰兴民间文学领域,这部反映农民暴动的长篇说唱本,仍然有着不可替代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 严华明

——读《遗带知县舒曰敬》有感

读《泰兴名人·遗带知县舒曰敬》，感悟颇深。“遗带者，遗风也”，是我从中获得的最基本的认识。

舒曰敬，江西南昌人氏。明万历年间，曾任泰兴县知县。在他任期结束返回故里时，因囊中羞涩，一无长物，只有平日换洗的一箱旧衣，以至“贫不能行”，只好将做官时的腰带解下来，变换成几块散碎银子做回家的盘缠。见此情景，老百姓为之怆然，“哭声震市”，大家暗地里凑钱把腰带赎回来。并以这根腰带为由，在东门建起了一个遗带亭。从此，“遗带知县”便成了泰兴百姓颂赞这位清官大老爷的专用用语。

一名知县，何以落得如此境地？是舒君无才吗？不是！他博览群书，尤工文辞，“以制艺名海内”，与汤显祖、邹德傅等称隆庆、万历间江西五大家。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只立轩前集》、《只立轩续集》、《四书五经讲意》、《时务要略》等；是舒君无德吗？更不是！上任伊始，他便见贤思齐，以范仲淹、尤袤等为榜样，心系百姓忧乐，关心百姓疾苦，恪尽职守，造福于民。因其德高望重，江西总督、巡抚及南北各省上奏朝廷推荐他出仕做官三十一次，均被他婉言辞谢。康熙《南昌郡乘》评价他：“行宜甚高，卑官乐道，有古人之风。”舒曰敬之所以如此拮据，解腰带以换碎银筹凑返乡盘缠，原因只有一个，廉之使然。悠悠万事，以民为本，唯廉为大。从头顶乌纱之日起，舒曰敬孜孜以求的就是“品正行端，当官贫过为民日；心安理得，卸任荣于在职时。”遇上这样的清官、好官，实乃泰兴百姓之万幸，岂有不钦佩、不喜欢之理？因此，为舒曰敬赎带立碑，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凡事皆有悖论,不能一概而论。在有些人看来,当官与发财是联系在一起的。像舒曰敬这样,忙到最后两手空空,连回家的路费都拿不出,还不如不当这个官。对于此类见解,虽然笔者不敢苟同,但它却引发了我的一番思考。笔者以为,舒君一踏上仕途就抱定了廉洁为官的宗旨,这就自己给自己堵死了来路不正的财源。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得的坚决不得,在不义之财、非法所得方面,让其始终归“零”。这个“零”决不等于空空如也的无。而是他政治的平安符,道德的守护神,也是他清廉为官的标识。清廉使他安详,安详展现坦然,坦然又令他宁静致远。从物质的一面考量,舒曰敬个人积蓄无几,是个贫乏者,但此消而彼长,从其思想和精神层面来看,他拥有很多。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在泰兴大地上在泰兴人民心中铸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上面镌刻的是生命的伟大,是业绩的辉煌,是人格的崇高。正是他这种宁可清贫遗带,也不浊富留憾的高风亮节,赢得了泰兴百姓的衷心爱戴。

古人云:“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意思是说,把清清白白做人的品质留给后代子孙,不也是很厚重的吗?舒曰敬未能给子孙后代留下金钱、豪宅、名车,但是却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清白”。他的遗带之举又一次昭示世人:一个人的物质财富可能很少,但是却可以很富有。其积累于内心的积极品格,以及他在努力过程中沉淀的毅力、自信心和勇气,已经悄然内化为他人格当中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被人们所看到,但却比看到的更为宝贵,更为强大。舒曰敬物质上甘于清贫,不因职务的升迁而变得贪婪,不受世俗的浸染而失去本真。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一年四季,普通衣衫,平民情结,百姓习惯。始终坚守人生的清纯,一种经过生活淘洗、岁月过滤后的释然而洒脱的清纯。那个时代,那种气候,有几人能为?又有几人能像他那样高擎自己的灵魂而活着?更多的人常常因为很可怜的一点蝇头小利、蜗角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为宝贵的东西,悲乎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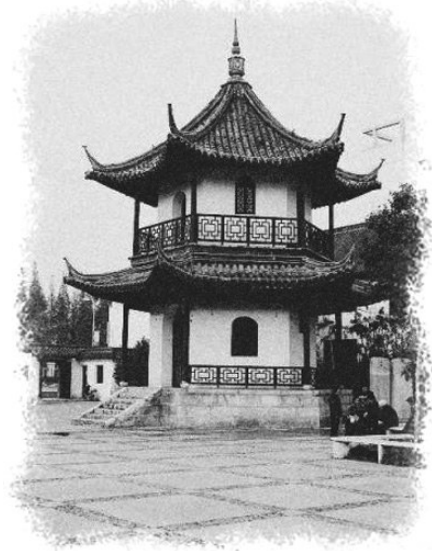
遗带者,遗风也。就其影响而言,舒曰敬留下的何止是一根腰带,他留下了刚正与果敢,留下了气节与操守,留下了俭朴与笃实,留下了如弘一法师所说的那种“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柔美至臻的绽放,留下了一股永远激励后人、引领来者的清廉之风。



泰兴的文化地标

——奎文阁

□ 王云峰



一座优秀的城市应有自己的地标建筑,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更应有自己的文化地标。泰兴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它的文化地标在哪儿?又有什么可以展示自己历史文化的地标建筑……

因为历史的缘故,泰兴老城遗留下的古建筑寥若晨星,在这些屈指可数的老物件中,奎文阁幸运地留存至今,且近乎保持了历史的原貌,显得弥足珍贵。

奎文阁,位于泰兴市鼓楼东路烈士堂南侧,建于清朝康熙五十年,乾隆四十年重建,是孔庙(文庙)内的一座两层六角攒尖顶建筑。古时,泰兴孔庙北起新图书馆(原大会堂)南至鲲化池,南北长约430米。奎文阁,位于孔庙东南角,与鲲化池相伴。今天,奎文阁、鲲化池以及“天开文运”牌坊这三处形态各异(阁、池、牌坊)而又相紧邻的建筑群,构成了泰兴古文化景观最为丰富的地块。奎文阁,因奎(魁)星楼、文昌阁合二为一而得名,大多数地方魁星楼、文昌阁是分开的一座独立建筑,像泰兴这样,魁星楼、文昌阁合为一体,并不多见。它的存在使得泰兴城既有文昌阁,又有魁星楼。奎文阁下层是文昌阁、上层为魁星楼,如果走近它,还能看到“文昌阁”、“魁星楼”的字迹分别位于一、二层的门额处。整座建筑,古朴典雅,结构精巧,端庄大方,是泰兴先人们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奎文阁是古代泰兴城的风水建筑,它具有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双重功能,寄托着泰兴先人对文化振兴的信念,也是泰兴地区文化昌盛的象征。

奎文阁历经二三百年的风雨,延续至今,实属不易。解放后,中国进行的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几乎摧毁了华夏延续了几千年的物质文明。泰兴城也不例外,在旧城改造的运动中,留下的古建筑寥寥无几,倒是奎文阁奇迹般地未遭破坏,今日它不仅成为城市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泰兴“建筑之乡”的历史证明,是泰兴城的



文化之根。如果缺少了这些沉淀了历史的建筑,城市必然缺少文化底蕴,这样的城市,环境再新,楼房再高,也是个缺少文化灵魂的城市。

拥有奎文阁这样的建筑,是城市的骄傲,相信也一定会被视作城市的瑰宝,作为城市形象极力地宣传,但是,在泰兴奎文阁却未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与地位。扬州府学保留下的唯一建筑——文昌阁,今天已经成为扬州城对外展示的地标建筑。我们的近邻泰州、如皋,历史上的文昌阁早已不存,近年来都陆续得到了重建。重建后的文昌阁,无论从建筑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不可与泰兴奎文阁相提并论,但它反映了人家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看一座城市的今天与未来,要看这座城市对历史的态度。因为,任何城市的历史都是和现实连在一起的。

稿 约

《泰兴历史文化》是我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刊。本刊以服务泰兴两个文明建设为己任,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提倡严谨平实的文风,竭诚为我市历史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打造交流经验、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本刊不定期出版,设有“人物春秋”、“延令史话”、“名士风流”、“文化遗存”、“红色记忆”、“百年老店”、“史海钩沉”、“方言俚语”、“济川风情”等栏目,欢迎广大作者积极参与。

投稿不拘一格,誊写稿、复印稿、电子稿均可。为方便联系,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泰兴市文化博览中心《泰兴历史文化》编辑部

联系电话:0523-87612769 电子邮箱:txsbwg@163.com

稿件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当期刊物一册。

凡在本刊发表作品者,本刊将推荐加入泰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泰兴方言考

□ 朱时可

◆ 副语第八 ◆

● 些

俗常用作语尾助词，如云：来些、去些、吃些、说些，皆音如洒脱之洒。

案新方言释器：“广雅，些，词也；曹宪音先计反，尔雅释文又音息贺反，语余声也，楚辞招魂用之。今淮西黄梅语声犹多言些，扬州杭州亦然，音如洒或促如杀。些犹尔也，词之必然也。”

● 不刺

此二字作文言“之至”或白话“得很”解；不刺读本音亦音如巴拉。

案西厢记：“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罕曾见。”颠者，轻狂也；不刺二字，解释互异；吾以为可作文书“之至”或白话“得很”解。如云：腥气之至，※泰兴俗语作小器得很，亦作小器不刺的，不刺音如巴拉。

● 偌大

俗谓如此大为偌大，偌音如惹，去声。

辈偌大犹言如此大也。如俗语称富有财产者曰偌大家私；称年纪老大者曰偌大年纪。见辞源。

● 债骄

俗谓难道或难不成为债骄，音如盆骄。

案庄子在宥：“债骄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注：“债骄者不可禁之势也。”泰兴俗语常用债骄二字作为难道或难不成之意。如云：依自家去看看，债骄我还会骗依。

● 儗恁

俗用儗恁作为就算或纵然之意，音如伊作。

案儗恁谓犹疑恁作也。荀子儒效：“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恁。”注：“儗读为疑；恁与作同。”泰兴俗语常用儗恁二字，对人表示道歉，含有就算或纵然之意。如云：儗恁我说错了，决不是故意为难。

● 刚刚

俗谓方纔为刚刚。

案刚音岗，纔也。苏轼花影诗：“刚被太阳收拾去。”刚刚犹恰恰也。老残游记第二回：“刚刚这河又插上了，还得等两天纔能走呢！”

● 索性

俗谓直截了当为索性。

案索性为表示断然径行之词。朱子全书学：“既不得为君子，而其为小人亦不索性。”俗常用作表示直截了当之意。如云：选举票数估计，既无当选把握索性放弃，不必竞选。



● 啲啲

俗谓将就为啲啲，音如农农。

案俗谓小声交语曰啲啲，见正字通。吴语，犹言将就，见辞海。

● 噉头

俗谓出言无度为噉头，噉音如秃。

案噉音铎。广韵：“口噉噉无度”谓出言无度也。通俗篇言笑：“世俗有所云噉头者，正谓出言无度人也。”苏州称书呆子为书噉头。泰兴谓出言无度曰噉头噉脑。

● 尴尬

俗谓有便为尴尬，音如间盖。

案尴尬音监戒，行不正也，见说文。段注：“今苏州俗语谓事乖戾者曰尴尬。”泰兴谓有便曰尴尬，不便曰不尴尬，并音如间介。例如俗语，尴尬请依当面谈谈，不尴尬就不必来；意谓有便即来，不便就不必来。

● 快些

俗谓快点谓快些，快音如少。

案快曰燥，快性也，见玉篇。俗谓快点为快些，如云快些来，快些去。

● 慢的

俗谓从缓为慢点。

案慢音幔，缓也，见广韵。俗谓从缓或不必快为慢点；如云慢点走、慢点吃。

● 怎的

俗谓做甚为怎的，音如枕念。

案怎的用如怎生、为何、做甚等义。《水浒》第四十五回：“不赔你便怎的。”

● 怎样

俗谓如何为怎样，音如枕桎。

案怎读如争上声，犹如此也。康熙字典云：“按此字广韵集韵皆未收，唯韩孝彦五音集韵收之。今时扬州人读争上声，吴人读尊上声，金陵人读津上声，河南人读如撻，各从乡音而分也。”怎样与怎么同，犹如何也。泰兴读如枕桎。

● 恁样

俗谓如此为恁样，音如嫩桎。

案恁样与恁么同，俗言如此也。传灯录：“三岁孩儿，也解恁么道。”

● 那样

俗谓如彼为那样，音如啰桎。

案俗谓如彼为那样。这样那样系相对名词。

● 故里

俗谓者里曰故里，音如格块，亦音如格开。

案新方言释词：“说文里，居也。今人通言谓此处彼处曰者里那里，音如字。夏口而下，滨江南北曰者里那里，音如孔悝之悝，或书作块，非。”泰兴谓者里曰故里，亦作这里。

● 啥个

泰兴问何人曰啥个，音如傻过。

案啥读如舍，何也。新方言释词：“余语之舒也，余亦训何，通借作舍，今通言曰甚么，舍之切音也。川楚之间曰舍子，江南曰舍，俗作啥，本余字也。”泰兴问何人曰啥个，犹云谁，不知其名而诘问之词也。

● 故个

俗谓此个为故个，音如格过。

案新方言释词：“故犹此也。江南运河而东至于浙江谓此为故，音如格。”增韵：“凡称此个为者个，俗改用这。”泰兴谓这个为故个。



● 那个

俗谓彼个为那个，音如啰过。

案那音娜，何也，见玉篇，俗谓彼个为那个。

● 畔个

俗谓边侧方向为畔个，音如蹦过。

案畔音叛，田界也，见说文，凡边侧皆曰畔，如枕畔、河畔。泰兴常用畔个二字表示边侧方位，如云：城隍庙东畔个是关岳庙，西畔个是文昌宫。

● 陡然

俗谓突然为陡然，陡音如斗。

案陡音斗，猝然也，汪莘忆秦娥词：“夜来陡觉霜风急。”

● 蹊跷

俗谓可疑或奇怪为蹊跷，音如技轿。

案蹊跷音奚超，犹言蹊跷。俗谓事违常理而令人怀疑莫释曰蹊跷。水游第十九回：“宋江见了这个大汉走得蹊跷，慌忙起身赶出茶房来，跟着那汉走。”

● 幸亏

俗谓幸而得到帮助，表示感激抱歉为幸亏。

案幸亏二字俗用作幸而得到帮助，表示对人感激抱歉之词。元曲玉镜台：“学士这多亏了你。”西厢记：“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上面亏了你，犹云委曲了你或难为了你。亏他，犹云委屈了他或难为了他。

● 海盖

俗谓总共或一齐为海盖。

案刘敞诗：“海盖午时消。”注：“每旦海气如雾，至午消尽，土人谓之海盖。”俗用作计较之词，作为笼统或一盐脑儿解。

● 顿党

俗谓一齐或整批曰顿党，音如等当。

案吴下方言考：“齐民要术云，顿当黄。顿党，一齐也；吴中为待事并为者曰顿党。”

● 笼统

俗谓总括为笼统。

案笼统，亦作 侏侗，统括浑同之义。朱子全书学：“今每觉心中有三病，笼统不专一。”

● 黄六

俗谓敷衍马虎为黄六。

案疑耀：“今京师勾阑中语，谓给人者为黄六，乃指黄巢兄弟六人巢居第六而多诈，故目诈骗者为黄六也。”俗谓待客菜肴马虎为黄六。

● 不二价

俗谓定价画一为不二价。

案不二价谓定价画一也。后汉书韩康传：“康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昔时店中多悬不二价木牌。

● 不相干

俗谓无关涉为不相干。

案淮南子兵略训：“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干。”今北方谓无妨碍或无涉曰不相干。

● 不海涵

俗谓对人发生误会不肯原谅曰不海涵。

案海涵。喻气量之大也。王僧为临川王让太尉表：“陛下海涵眷育，日镜云伸”泰兴俗语对人不原谅或不高兴曰不海涵。

● 不跷欹

俗谓不料为不跷欹，跷欹音斜疑。

案跷欹音如超漪。朱子全书学：“只是坚立著志顺义理做去，他无跷欹也。无跷欹犹云无



可怀疑也。俗谓不料曰不晓欵：如云：我以为他很老实，不晓欵他竟做贼。”

● 假冒价

俗谓假称不知为假冒价，音如贾默阁。

案冒音毫，蔽也，又假称曰冒。前汉卫青传：“冒姓卫氏。”注：“冒为假称，若人首之有覆冒也。”价系助词恒附于副词之后：今语用的、或用地。俗语假冒价犹云假称不知的，价犹的也。如苏沪俗语：“像煞有价事”之价，亦用同的字。

● 眼挪儿

俗称片刻或转瞬之间为眼挪儿。挪音如那。

案挪音雉，搓挪也，见玉篇。俗谓移动为挪。泰兴谓一忽儿为眼挪儿，犹云一转眼之间也。

● 难谓你

俗作为对人答谢之客气语曰难谓你。

案新方言释言：“说文，谓报也。齐策吾独谓先生何乎。注：犹奈何也。案凡言谓某何者，多有难于酬对之意，是亦报也。今人谢人劳苦则曰难为你，犹言难报也。”

● 一盪脑儿

俗谓一齐为一盪脑儿，盪音如股。

案盪音古，嚏也。左传僖二十八年：“晋候梦楚子伏己而盪其脑。”今俗语谓一齐为一盪脑儿，当本于此。

● 聃聃错错

俗谓小声私语为聃聃错错，音如缉缉措措。

案新方言释言：“说文，聃，聃语也，诗曰，聃聃幡幡，七入切。今人状私小语曰聃聃错错。”

● 泄泄沓沓

俗谓举动迟缓为泄泄沓沓，音如自自塔塔。

案泄音曳又音薛，泄泄，舒徐貌。沓音踏，沓沓，弛缓意。孟子：“泄泄犹沓沓也。”注：“怠缓悦从之貌。”

● 跌跌踵踵

俗称两足失据行路歪斜为跌跌踵踵。音如迭迭侏侏。

案跌音盩、蹶也、仆也。前汉鼂错传：“跌而不振。”注：“师古曰：跌，足失据也。”

诸容切，音钟，行不正貌，见玉篇。俗谓两足失据，行走歪斜状似酒醉曰跌跌踵踵。

● 蹶蹶蹦蹦

俗称边跳边走为蹶蹶蹦蹦，音如厥厥蹦蹦。

案蹶音厥，跳也，见说文。蹦音朋，走也，见玉篇。俗谓边跳边走为厥厥蹦蹦。

● 鬼鬼祟祟

俗谓言行不光明为鬼鬼祟祟，祟音如岁。

案俗詈人暗中施行机谋曰鬼鬼祟祟，见辞海。祟音粹，神祸也，俗常误读为崇。

● 倭子鞞子

俗谓语言不清楚为倭子鞞子。

案俗称日本人为倭子，蒙古人为鞞子，因为语言不通，故常假以讽人说话口齿不清为倭子鞞子。